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ext Scan Input Form - Title Page

Work:	W1PD89023	ImageGroup:	I1PD89027
LCCN:	n/a	ISBN:	n/a

Title:	gan zi zhou wen shi zi liao xuan ji (4)
Author:	n/a
Descriptor:	written in chinese
Original Publication:	[dkar mdzes khul rig gnas lo rgyus kyi dpyad yig] [gan zi zhou wen shi zi liao];di 4 ji
Place:	dar mdo
Publisher:	[srid gros dkar mdzes bod rigs rang skyong khul u yon lhan khang]
Date:	1985
Volume:	1
Total Volumes:	1
TBRC Pages:	2
Introductory Pages:	n/a
Text Pages:	n/a
Scanning Information:	Scanned at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150 West 17th St, New York City, NY 10011, US. Comments: 2009

甘孜藏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TBRC
Catalog no. W1P089023
Scanned at
Outlined by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泸定县专辑)

泸定县政协供稿

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目 录

建置沿革	阳昌伯 (1)
任乃强教授对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	泸定县政协文史组辑 (4)
泸定桥概述	文荣普 (11)
康熙误笔与泸定县名由来	阳昌伯 (21)
泸定土司历史	席珍、阳昌伯搜集整理 (26)
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	郑世杰 (33)
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	倪德元 (36)
回忆我的父亲	周玉炯 (40)
袁品文事略及其泸州起义回忆	阳昌伯、宋玉春整理 (46)

天主教在泸定的始末

..... 阳昌伯 (62)

泸定人民的反帝反清运动

..... 阳昌伯 (68)

袍哥在泸定的情况

..... 李远钦、郑成基 (72)

“岚安事件”回忆

..... 曹本厚 (75)

清初化林、泰宁、阜和三协兵制演变考略

..... 张康林 (80)

李含章与长春堂

..... 范述方 (94)

“岳公爷打大岗”是讹传

..... 阳昌伯 (98)

磨新琐谈

..... 王福安 (101)

古道、背子、口溜

..... 倪德元、席珍、阳昌伯整理 (107)

编后记

..... 马崇止 (111)

建 置 沿 革

阳 昌 伯

泸定在古代,按《尚书·禹贡》九州,属梁州西部。周、秦时代,则是“笮国”的地方。所谓“笮国”,是对古羌族之进入河谷地区兼营农业者的统称。

汉武帝开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前111)置沈黎郡,治笮都县,本县为笮都县地,郡治即在今沈村。天汉四年废郡,为牦牛一县,属蜀郡西部都尉。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属蜀郡属国都尉,从灵帝到蜀汉都属汉嘉郡的牦牛县。

西晋时仍属牦牛县,至成汉时,复于牦牛县置沈黎郡,领城阳、牦牛、晋乐三县,泸定属晋乐县,县治在沈村。

南北朝时,南朝政权实力未到川西高原,四川地区尽入西魏版图,晋乐县的汉人已内徙,成为江原郡的侨县了,到隋代,泸定地区在嘉良范围内。

原居住在丹巴的嘉良族,因内乱支分来泸定居,附唐诸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在泸定设置嘉良县,县治在今嘉靖河坝。贞观初废县改设嘉良羁縻州,隶雅州都督府,后来黎州都督府,唐末附吐蕃,更号“嘉靖”。

唐高宗仪凤四年(679)析汉源县置大渡县,大足元年(701)改属黎州,武后长安二年(702)划入飞越县,仍留戍守称大渡戍,乾符二年(875)就戍所筑大渡城。其城在泸定沈村。唐代在泸定废县后,境内曾设许多羁縻州;隶雅州的有罗岩州、当马州;隶黎州的则有河东州、大渡州、上贵州、贵林州和叶(野)川州。罗岩即今岚安,当马即今岔道、嘉靖,河东、大渡即今冷碛至得妥一带;上贵州即今康定、贵林即今鱼通,后又称下贵州,叶川州则

相当于新兴、磨西地面。这些羁糜州的名称一直保持到宋代。尽管当时有这样多的羁糜州，但其中最强大的部落为“三王部落”即天全的杨王，汉源的郝王，驻牧沈村的刘王，本县成为刘王的领地。（今沈村“白马坟”即刘王墓）。这个局面，保持到整个宋代，三王之下又有许多小土司。

元世祖忽必烈亲率元军由阿坝循大渡河谷南征大理途中，把黎州、碉门、冷碛、沈村、叉道、岩州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把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土司并为一个宣慰司。并在烹坝境内置长河西营军万户府，因此泸定河东地区隶天全六番招讨司，而河西地区则隶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了。

明代在泸定境内复置三土司即：沈边长官司，辖佛耳岩以下河东地区，和新兴、磨西、德威等地，以扯索坝观音岩为界；冷边长官司，辖佛耳岩以上至岚安河东地区；长河西千户所辖河西自扯索坝观音岩至今康定大藏桥。

清初沈边土司和冷边土司于顺治九年（1652）内附，沈边隶清溪县，冷边属天全州。长河西千户所，清初为青海和硕特部所并，康熙四十年（1701）平定西炉后，复其土千户职，改称咱里土千户，统辖于打箭炉明正土司（即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清初于化林坪设“汛”，康熙二年（1663）改汛为营，设守备、标兵一营。三十四年（1695）设参将。四十三年（1704）改营为“协”。设副将，辖中军备守一营，驻化林，分辖把总三员，驻防泸定桥、打箭炉、泥头三处，各配兵五十名。所有汉土官兵皆受副将统辖。雍正七年（1729）移副将泰宁，化林改置都司。

雍正六年（1728）置泸定巡检司，管理铁索桥和沈村烹坝驿站，隶雅州知府，光绪三十年（1904）隶打箭炉同知。宣统三年（1911）与化林都司同时裁撤。是年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收缴泸定各土司印信，置泸定桥设治委员，同年七月初四，布告改为

泸定县，因四川掀起保路同志会运动，废即暴发辛亥革命，设治未果。

民国元年（1912）川边经略使打箭泸镇抚府将沈边土司和化林营汛防地改为化林县；冷边和咱里土司地改为泸定县。民国二年（1913）改化林为县佐，属泸定县，由此，泸定成为单一的县治。民国三年（1914）属川边特别行政镇守使。民国十四年（1925）属西康屯垦使。民国十七年（1928）属二十四军西康政务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属西康行政督察区。并将化林县佐并入二区。是年五月毛主席率一方面红军长征过泸定桥北上，十一月红四方面军从丹巴南下进入岚安境内，建立岚安苏维埃政府。民国二十八年（1939）直属西康省政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一九五〇年三月解放军经泸定进驻康定，康区正式解放。泸定县纳入康定专区，十一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政府成立，划泸定为其属。一九五五年十月，西康省撤销，泸定县属四川省雅安专区，一九五八年又转划属甘孜藏族自治州。

任乃强教授对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

文史辑

编者说明：任乃强教授，现已九十高龄，一生研究康藏史地，造诣很深，著作丰硕，对泸定古代情况尤为熟谙，曾著《泸定导游》一书问世；对我县史志工作，热心支持，请教问题，耐心解答。《泸定历史沿革》一稿，亲予批阅，提供近年考证所得，并叮嘱：“凡我考证之处，请公开讨论，征集新的不同意见，趁我在世之日，进行修改”。意诚情切，感人肺腑；特将几次来函，摘要刊出，敬希读者，参与讨论，提供宝贵意见。（小标题是编著加的）

一、周、秦为“笮国”地

笮（笮、笮音义同）皆是指的溜索桥。古代康藏高原的羌人作此方法渡河称之为笮。华人对于用笮索渡的民族都称为笮国，其完全是古羌族之进入河谷地区兼营农业者的统称，不是他们自呼如此。他们各支自呼不同，如邛崃山脉以东青衣江流域的羌支，自呼为“徙”（斯渝）。邛崃山外，大渡河流域的羌支，自呼为“白狼”；高原上的牧羌，则为牦牛种（施牛王）。后来渐已接受华夏文化，与汉族有了共同语言，并皆改用皮船、木船、铁索桥渡江、不用溜索，“笮国”的名称亦即消失了。

二、汉置笮都县在沈村

《史·汉西南夷列传》说的以“笮都”为沈黎郡，《汉书

注》引‘茂陵书’，沈黎郡有二十一县。我考沈黎郡治笮都县，就在泸定沈村。所领二十一县，包括有旄牛（今汉源之清溪）、严道（今荣经）；徙（今天全始阳）青衣（今芦山宝兴地亦属之），与定笮（今盐源）、大笮（今雅砻江下游泸宁营以下河谷）、笮秦（今地难定，可能不出今盐边、木里、九龙地界）。余十三县不可考，大抵包括今泸定、康定、雅江、道孚、与九龙木里、盐源、石棉、汉源和雅、芦、宝、天、荣十四县地。那是大小夷王二十一个分据的地方。那些贪汉赏赐，震汉兵威，受汉招抚，纷纷请置官吏为郡县。实际是习俗不同，甚至语言不通，汉官无法管理，汉军亦难于到的地方为多。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贪在他们自愿来归，开拓边境，以利于打开通往身毒（今印度）大夏（今阿富汗）的路，便置了沈黎郡了。除青衣、徙、严道、旄牛四县当蜀邛邛大道有汉民与戍军外，大都以各夷酋子弟为令长，因其俗以治之。只郡守是朝廷派的带一批人去，分派到夷酋居邑，指导、联络、推行政令。山川险远，汉吏多不原往，成了“贤者不往，往者不贤”的郡县。反转过些夷汉矛盾，难以治效，所以建郡十四年便罢除了。

罢郡后，青衣、徙、严道仍还蜀郡；大笮、定笮、笮秦三县划属越西郡。剩下广大地区，似皆交与旄牛王（驻今木雅乡）代管，一并隶属旄牛县。因为那些夷落都要到旄牛县来与汉商市易。于是朝廷设了两个蜀郡西部都尉，来镇守这些地面。“一居青衣主汉民（保护汉民管制夷民）一居旄牛主徼外夷”，（旄牛县徼外原沈黎郡诸夷落）。郡治笮都县这时怎样呢？大概亦是交还夷酋管理了。那里的夷王，便是唐代的“三王部落”中的刘王。今沈村所谓的“白马坎”便是唐代的刘王墓。这个刘王与天全的杨王，汉源的郝王，都是接受汉文化最早的笮（溜索桥）地夷王。刘王开化最早，也最富庶。所以能建造那样宏伟的坟墓。他独富庶的原因，是因为康藏高原的牧民，与蜀地进行市易，原只有从康定木雅乡、逾雅加埂、下磨西面，过摩岗岭、到咱威河

边溯索渡过沈村、再逾飞越岭到邛崃山下清溪城（古旄牛县）蜀邛大道上来市易。（那时康定河峡尚无通路、另外只有从松潘入蜀的道路）。所以这个沈村渡极其重要，汉开沈黎郡，便选定了此处为郡治。那个无名的刘王在这建郡的十四年中，经常与汉官吏与汉地工农人民接触，深慕华夏文化，对汉朝廷世代效忠，也得到汉官的信任、从而富庶强大起来，成为三王之首。废郡后来曾保留笮都县原因，可能是一来汉官不原过飞越岭，也因为刘王是可靠的夷王。旄牛县官吏能控制他，故将其地与徼外夷地一并划属旄牛县。

三、晋代是晋乐县

晋乐县名首先见于《宋书卷三十八益州》晋原郡属县。原书云：“晋乐令《何志》故属沈黎，晋《太康志》无沈黎郡晋乐县”。沈约这篇《州郡志》工作是做得很细致审慎的，可以说它树立了整理纷乱庞杂旧史料，实事求是的典型，与《汉书·地理志》异曲同工。《班志》是使用完整旧簿籍的典型，《沈志》是整理纷乱旧史志的典型。由于东晋年代各州郡人民流徙所在成侨郡县，与旧有的州郡县区混杂淆乱，有的版籍，同名异地，加以随时移徙，坐在家里的学者，当靠文簿来编次州郡，只是一团纷乱，无法定出“真假包公”来，他只好混合序列各志所出，老老实实，进行核对。指出哪部书有；哪部书无，并不自己裁断，让览者自去分析。却因为他依靠真实，后人也就分析得正确。这是沈志最值人称道之处。《沈志》的益州“晋太原郡领县五”。那就是江原、临邛、普乐、徙阳、汉嘉。除晋乐外；全是汉代旧县。其地在今雅安专区这与温江专区的邛、崇、大三县。而晋乐这个县，是《太康地志》所无的。即是说：西晋时，还没有这个县。另方面，西晋的太康末年，巴蜀已乱，邛州地面全已为“夷僚所据”。这个晋原郡无由新立。新立，也只能是邛州前身，不

合以江原为首县。可以判断，这晋原太守，是个侨郡。再看：在李雄与罗尚战争期内，蜀中的大姓世族，几乎全部都向外流徙了。史家综括为“东下荆湘，南入七郡”这两句话。（《华阳国志》）。南中七郡，越西郡（今西昌地区）与蜀郡交通最早，蜀民从此流入者必多。江原以下四县，流入越西地面是极其顺便的。入越西后，就地垦居，联合成立为一个侨郡，江原人多，便以江原为首县，郡名晋原，表示他们是不服从李雄新朝的“晋人”。临邛、徙阳、汉嘉三县人也不少，便各自组成为“侨县”。另外还有些其他蜀地流来的侨民，被接在四侨县之外，则组合成为一个新县，取名“晋乐”。这样推断，是与当时西南社会情形符合的。不可能有人提出反对的理由来。至于晋乐县令驻在地方是否就是泸定境内，则是断断不可能从解放前的旧书里找出明文作证的。我初亦未注意这个问题。只在1959年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书时，反复研究大西南地区的地理形势，与民族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以分析旧籍里的文字，作出过这一假定，写进了这部书内。兹只谈我自己的论断：

泸定的沈村，是汉魏六期朝时旄牛王国（牦牛种羌）与蜀郡市易的最大市场。所谓“以笮都为沈黎郡”，便在此处。……沈村、冷碛、得妥和化林坪这带地面，是温暖宜于农耕的河谷，与四川盆地以大山相隔，李雄的军队不易达到。所流向越西的人留在大渡河谷而就地垦居的人多。通过大相岭向清溪、汉源、富林、大树堡一线旧路留下垦居的人多些。再由汉源盆地旁流入口棉盆地的人会比较少些，转入泸定盆地的人更少些，并且是更后来的。所以其地蜀郡地方来的人组成的晋乐县，合当在泸定多些。并因其地原是笮都旧县，他们要求建成新的侨县更有充分的理由。不过不用笮都而用晋乐的名称，表示晋人乐于居此，是很自然的。这虽是推断，是用历史地理科学方法创制的假说，尚待讨论和地下发掘来作验证，亦无人能够提出绝对不然的论据来，那便是值得信赖的假说了。

四、唐代置嘉良、大渡县

唐高祖初年（618）在泸定置嘉良县，名见《旧唐书地理志》，我考嘉良县在今泸定嘉靖河坝。原系住丹巴嘉良夷。因内乱支分来此居住，附唐请封，高祖因之立嘉良县。贞观初废县改嘉良羁縻州。隶雅州都督府，后转隶黎州都督府。唐末附吐蕃更号嘉靖，嘉为其族称，靖是强大之义，其后属长河西土司。

大利县可能即是大渡县之讹，因为《旧唐书》边鄙地名多字讹……大渡则在唐仪凤四年（579）即曾置县，长安二年（702）省入飞越县（汉源三交坪为飞越故治）。仍留戍守称大渡戍。乾符二年（875）川西节度使高骈还就戍所筑大渡城。宋时汉源有大渡镇，《明统志》说大渡镇在黎州司北一百里。这些都是正史传记有明文的，我考其城即在泸定沈村。（说在《吐蕃传地名考释》）这与三王部落的历史有关系，元世祖征大理国（今云南大理）曾入雅州渡过此地。（另详《雅安地区地名考释》）

五、唐末至宋属“刘王”领地

唐末吐蕃与南诏先后侵夺西、黎、雅州，汉民又一次退出大渡河地区，本县成为“三王部落”中的刘王领地，三王部落即表示亲附华夏，又暗通吐蕃和南诏，使唐、蕃、诏都能保护他们的地方政权，维持商业交通。驻牧沈村的刘王先富裕起来，这个局面，保持到整个宋代。尤其南宋年代，由于陇右失陷了，茶马市易集中到四川西徼，三王部落擅居间之利，大渡河谷小土司勃兴，皆附三王。于泸定南境属刘王，天全县境属杨王，汉源县境属郝王。杨王与刘王争蕃茶市场，新开鱼通，岩州、打箭炉茶路。由于岩路险狭，不通驮运，只能用人力背负，当时称为“小路茶”，（至今仍把天全茶称小路茶，因其历史悠久，明清统制边茶于雅州，亦仍容许小路茶保存旧制）。于是杨王也富裕起来

了。（只施牛、西州一路茶市不旺、商利较小）。

六、元隶两土司

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分兵三路，中路是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鱼通、长河西等土司和河东的岩州土司率先迎降。时岩州土司名高宝锡，本天全杨王属下大头人，派驻岩州。既先迎降，并导元军入陷雅州。其时宋将与蜀人抵抗元军甚力，故忽必烈待东路大军不至，乃复渡大渡河往征云南。由是雅黎两州不隶四川（终元代）者垂一百年。高宝锡以功授天全六蕃招讨使。三王与水平诸小酋皆受节制。（编者注：六蕃指黎州、碉门、冷碛、沈村、叉道、岩州等地都在大渡河以东）。

元世祖又并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土司为一个宣慰司，其土官系木雅乡的瓦述族人。汉代的施牛王在唐末消灭了，其地面发展为几十个小土官。降附吐蕃，奉喇嘛教，各自建造喇嘛寺。元征大理，这些土官迎降最早的是色巫绒土官。所以元朝奖励他，把迎降较后的长河西（即咱哩土司）鱼通（打箭炉也是鱼通地）宁远（即石棉土司失名）都划归他管，正如把刘、郝、杨三王与董、卜、韩胡都划归岩州迎降的高土司而称为天全六蕃招讨司是一样的。这两土司都见于《元史》并非明代才有。（编者注：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所属泸定境域均在大渡河以西）

七、部分地名解释

（一）唐西面：汉代居住的是磨些（古读索）族，现称“拉哈族”。“面”是汉人加的，意指那面是磨些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又把“些”改成了“西”。

（二）长河西：从泸定经石棉的这段河流和安宁河，古代都称“长河”。河西即“长河西”。

（三）宁远：磨西以下到石棉地带称“宁远”。

（编者曾面问有的说指乾宁地方确否？任老笑着说：那是按照我年轻时写的说的）。

（四）冷碛：古代叫“东嘉靖”。西嘉靖即今嘉靖河坝。嘉指嘉良族，靖是“大”的意思。现称冷碛，“冷”是地名，“碛”是河坝的意思。

泸定桥概述

文荣普

泸定铁索桥，是大渡河上建得最早而又最长的一座桥梁。它不仅以川藏交通的要衢，著名的军事要津称著于世，更以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业绩驰名中外，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61年3月4日，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泸定桥的历史，历无专门著述，所见资料又十分零散，且不全。现作初步整理，以供参考。

一、建桥起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藏汉之间，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友好往来。唐代开始，又出现了以马换茶的贸易活动。至元代，四川的雕门（天全）成为茶马市场中心。明代以后，打箭炉（康定）发展起来，四川西部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打箭炉一线运入西藏。深切在二郎山和贡嘎山之间的大渡河，水流端急，入藏道上的沈村、子牛、烹坝三渡口，只有靠溜索或牛皮船来解决交通问题。来往极不方便。

要在大渡河上修建桥梁，引起清朝政府注视的，还是发生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的打箭炉昌侧集烈之乱。

清朝初年，大渡河东岸的冷边长官司、沈边长官司归附清廷。1666年（康熙五年），大渡河西岸的长河西宁远鱼通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也归附清廷。1696（康熙三十五年），西藏派出营官入驻打箭炉管理贸易事，四川巡抚于养志前往勘界，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但“居数年，营官噶巴昌侧集烈

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击杀明正土司 蛇蜡喳吧，伤官兵”。

（《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六）清政府命侍郎满丕和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平定昌侧集烈的叛乱活动。唐希顺雪夜渡过大渡河，分兵三路进攻，“战五日，各路俱捷，歼蛮兵五千余，斩噶巴昌侧集烈，遂复打箭炉，喇嘛、番民俱降。寻抵木雅，香目错王端柱等缴款印，归附喇嘛、番民万二千余户”。（《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七）。

昌侧集烈之乱平定以后，打箭炉一下增加官兵三千余人。当地只产青稞、麦子、豌豆之类，粮价猛增。据《打箭厅志·筹边》：载“官兵未到打箭炉时，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一钱五、六分，一钱八、九分，二钱不等。官兵入炉以后，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二钱八、九分或三钱不等”。打箭炉系新复之地，急需驻兵，但驻多少为宜，粮饷的运输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虽然后来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大部队驻在大渡河东岸弹压，打箭炉只驻少量部队，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1704年3月（康熙四十三年二月），能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清史稿》卷八）。上任后向康熙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岩夹峙，一水中流，¹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诏从所请，于是鳩工构造”。（《御制泸定桥碑记》）

桥址安乐，即藏名“ཨ་ལོ་”音译。也有译为“阿龙”或“阿垄”。据任乃强《泸定导游》考证：泸定桥东岸与安乐坝原是连成一体，的都叫安乐。后大渡河改道，把安乐一劈为二，南面一段称安乐，叫安乐坝，北面一段则呼为桥上。当时把桥址选在这里，一则是西岸有坚固的岩石为天然桥基，二则是地名吉祥——安乐。

二、建桥经过

1、建桥时间 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卫藏通志·程站》：泸定桥，“康熙四十年建”。据《清史稿》，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四川巡抚于养志被剥职（后被杀），由贝和诺担任四川巡抚。如上所述，泸定桥是能泰在康熙四十三年二月担任四川巡抚后，上奏康熙修建的，动工时间绝不可能早于能泰上任时间。康熙四十年修桥的说法不能成立。其二是《雅州府志·津梁》载：泸定桥“建自康熙四十四年，成功于四十五年四月，告竣”。据泸定桥西铁碑碑文抄件（原碑已于1966年破“四旧”中砸毁）：“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未时合龙口”。又泸定桥西岸将军柱铸文。“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八月造”。由此看来，泸定桥的修建时间，应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至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历时一年多。

2、修桥人员 监工官：“化林营参将杜汝（琨），化林营守备杨君（强），黎东所千总张鹏飞，提标千总汪弘臣，查阅官吉尔图，华时”。（据铁碑抄件。括弧内的字是根据其它资料加上去的）。铁工，据桥头将军柱铸文，有“陕西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相传，马之常系掌墨师付。普通人工，则从当地抽调。据《泸定县乡土志》载，沈、冷土司在修桥过程中是颇为卖力的。

3 修桥办法《小方壺斋舆地丛钞》载：“康熙中修建此桥，曾于东岸先系铁索，以小舟载铁索过重，未及对岸辄复，久之不成。后一番僧教以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再以铁索入筒，缚绳数十丈，于对岸拽其筒，筒达铁索亦至”。解放前多次参加维修泸定桥的老铁工认为，将铁索入筒是不可能的。按维修泸定桥时卸，上铁索的办法，是用青竹蔑编结成起重绳，把竹筒或木筒穿在起重绳的两端，中间套上篾圈，筒和篾圈上都系上绳子，吊上铁索，然后用七、八十人在对岸用长绳把铁

索拉过去。固定后解开绳子，再拉第二根铁索。

4、修桥经费及铁的来源：修桥经费未查到可靠资料。据当地传说，泸定桥十三根铁索代表全国十三个行省，由十三个行省募捐而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天全六番部》载：“泸定桥，在泸水上，地属沈、冷姜村，康熙四十五年所制铁索桥也。西炉复木雅，附置戍守，税茶市而桥因以建，桥工费甚巨”。茅以升据此又认为是用茶税筹集的款。（《茅以升科普作品选集·五桥颂》）铁的来源也未找到可靠资料。泸定不产铁，离泸定最近而冶铁历史悠久的荣经。1936年维修泸定桥用铁量较大，所用之铁全部从荣经搬运。历次维修亦用荣经铁。康熙年间修此桥、工期短，也以用荣经铁的可能性为大。

5、桥的命名：《御制泸定桥碑记》曰：“桥成。……绘图上来，深愜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在泸定桥西有一正书“泸定桥”石碑，碑上镌刻着“康熙御笔之宝”方形篆文印，说明泸定桥桥名不但为康熙所定，而且还亲笔题了桥名。

所谓泸定，即昌乐集烈之乱已经平息，泸河一带已安定之意。

泸河，即大渡河。为什么把大渡河称为泸河呢？明清时期，当地讹传打箭炉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造箭之地，大渡河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泸河。《御制泸定桥碑记》“考《水经注》，泸水源出曲罗，而未明指何地，按《图志》，大渡河水即泸水也”。其实，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泸水，也不是指大渡河，而是指若水（雅砻江）与淹水（金沙江）汇合后的一段江流——泸江水。

三、桥的结构

泸定桥结构特殊，造形别致。大体可分为桥身、桥头台和桥头亭三个部分。

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九根作底链，余四根均分两边作扶手用。据实测，东西桥台之间净跨100米，铺桥板后桥面长（不包括桥台部分）101.67米；底链每根间距0.33米，总宽2.7米；底链上铺3米长，0.10米宽的横桥板，横桥板间隔相铺，形如栅栏；横桥板中间，再铺一条0.75米宽的纵形主走道板，两侧靠扶手处各铺一条0.20米宽的辅走道板，人来人往，穿梭自如；在扶手与底链之间，每隔5米左右又用小铁链与底链相联，使桥身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一踏上桥面，整个桥身一齐灵动起来，起伏荡漾如泛轻舟。

桥头台 东西各一座。条石砌成，形如碉堡。西桥台建在坚硬的岩石上，高5.2米；东桥台建在乱石滩上，高14.5米（冬天枯水临水处）。东西桥台上，各有一落井。西落井长4.8米，宽2.85米，深4.7米；东落井长4.5米，宽1.6米，深4.9米。落井内埋着与桥身相平行的地龙桩。地龙桩在东落井内有7根，西落井内有8根。地龙桩下，横卧着一根与桥身相垂直的卧龙桩。卧龙桩直径20厘米，长33.5厘米。十三根铁索通过东西桥台，进入落井，用钢绳牢牢地锚在卧龙桩上。为了加强桥台的坚固性，据说，条石与条石之间打有榫头，关键部位还灌注铁水。1974年大维修时还发现，东桥台底部与岩石接触处，铺了一层桫木夹块石。有关人员认为，大概是由于当时缺乏锚平岩石的设备和能力，为了把压力均匀地传到岩层上而采用的。

桥头亭 建在东西桥台上，起着保护落井内的铁索不受雨水侵蚀的作用。桥头亭为木结构建筑，飞檐翘角，古朴大方。据说，原来每一个檐角都系有铜铃。和风吹拂，叮冬作响，十分清脆悦耳。

泸定桥的主要构件是铁，严格说来，是一座铁链桥，由28毫米粗的铁条手工锻打成铁扣联结而成。铁环每扣宽9厘米，长17厘米至21厘米不等。还有一种只供在落井内使用的长扣，每环长40厘米。据1977年统计，十三根铁索共有12164个扣环，重约21

吨。如加上其它地方的用铁，总计约40余吨。

四、管理与维修

桥一竣工，四川巡抚能泰就疏报朝廷：“请移化林营沈村防守千总一员，兵一百名镇守”。清政府应如所请。并上谕大学士等曰：“往达赖喇嘛地方，途中铁索桥甚多，是以安乐地方亦如彼处建铁索桥。然此处之桥与云南铁索桥不同。云南地方于两石崖贯铁索建桥，极其坚固。今安乐地方立石柱贯铁索为桥，久之恐未必坚固耳。其移兵防守之处，著照该抚所请行”。（《清实录藏族史料》）于是，“设兵于桥东西两岸，盘查过往行兇，朝夕启开封锁，稽查更甚严密”。（《打箭炉厅志》）

雍正六年（1728），泸定桥始设巡检。乾隆年间，泸定桥有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兵五十名扼守。清末，兵员减至36名。在民国年间，则完全由桥关委员管理了。

为了延长桥的寿命，泸定桥还采取每年只开桥七个月的办法。在桥上游一里许，“设渡船二只，巡检专司之。水盛过桥，退则由（船）以渡”。（《打箭炉厅志略·津渡》）据当地老回忆，解放前，每年旧历三月初一至九月三十日为开桥时间，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二月三十日为封桥时间。封桥期间，凡运货的客商一律到船头乘渡船过河。

泸定桥铁链由生铁制成，极易锈蚀断裂，故采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办法。“沈、冷本天全部属，桥即成，概天全公修葺”。（《古今图书集成·天全六番部》）维修内容包括“修紧及护桥墩、护堤洋圈工程、船修造”。维修款由“建昌道委天全州办理报销”。（《打箭炉厅志略·津渡》）民国年间，按殷之浩、王大淦《大渡河桥之探讨》文，维修由“天全担任督工之责，完成后由汉源担任验收，泸定县负责保养。平时之修理。均由三县会同办理”。一直参加泸定桥维修的老铁工姚宪华

回忆道：“在天全的长河坝有一片竹林，称为皇林，专供维修泸定桥使用”。

在维修过程中，分工明确，制度严格，每一个铁工必须在自己打的铁扣上打上印记，以备查。

除日常例修外，泸定桥还进行过数次抢修。据不完全统计，有历史记载的（1950年以前）如下：

1、1741年5月（乾隆六年四月），泸定桥被风吹拆，拨银七百六十两兴修。

2、1776年8月9日（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打箭炉（康定）海子山发大水，10日晚大渡河山水随发，高出桥面数尺，将铁索桥冲断。秋后动工修复。

3、1908年4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人行桥上，加以大风吹动，底链断裂。

4、1915年冬，泸定居民不警于火，东桥头亭被延烧。次年大体按原样修复。

5、1919年7月，桥链为风折其三，不数日，又再折其三。1920年修复。

6、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敌二十四军四师五旅三十八团溃逃时，纵火焚烧东桥头亭。红军进城后迅速将火扑灭。次年修复如旧。

7、1935年6月7日前后，红军长征后卫部队撤离泸定桥，为减缓敌军追击速度，锯断底链四根。次年修复。

8、1942年2月，西岸民房失火，西桥头亭焚毁。当年修一简易桥头亭保护落井。

9、1944年冬，铁索桥底链断裂一根。当年修复。

10、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过泸定桥时，底链断裂一根。当即修复。

泸定桥承重量小，又常发生事故，为适应藏汉交通事业的日益发展，1911年（宣统三年），泸定桥巡检宝察曾拟改修泸定桥为

钢缆桥。后辛亥革命爆发，未果。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大西南的解放事业以后，为彻底完成解放西藏，巩固边防的任务，由西南交通部负责，于1950年7月筹划并设计，11月正式动工修建泸定钢索悬桥1951年5月底胜利完工，6月初正式通车。从此，泸定桥再不承担川藏运输的繁重任务。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泸定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党和政府对这一重点文物十分重视，多次拨款专款进行维修。特别是在1976年至1979年，由国家文物局拨款恢复了东西桥头亭的历史原貌；修建了东桥头防洪保坎；修补了东桥台裂缝；用直径28毫米低碳圆钢，按原样电焊后锻打六根新链，更换六根旧底链（余三根底链未换）。在这次大维修中，对落井口的长、短扣联接部和摧链方法也进行了革新，从而增加了桥的强度，提高了维修工效。

1980年9月，泸定成立了文物专门机构——泸定桥文物管理所，负责泸定桥的日常管理和维修工作。

五、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

为宣传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业绩，一九八〇年，在泸定桥东岸建立了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

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是建立在全国重点文物泸定桥原状陈列基础上，的一个辅助性陈列馆；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战斗前后的图片、实物、图表、雕塑、绘画等手段再现革命历史，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是陈列、研究、收藏红军长征时期在泸定县遗留下来的革命文物为主要工作的文化事业机构。

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的建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58年，红军长征革命文物纪念馆。

195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党中央领导下，筹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广泛征集革命文物。甘孜军分区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前来泸定，在泸定县人民委员会，泸定县人民武装部的大力协助下，征集到步枪、斗笠、饭盒等一百一十多件革命文物，从中选出九十多件送交成都军区。

在协助这次文物调查征集工作中，我县工作人员拍摄了部分战斗遗址照片；填描了红军在岚安书写的标语、漫画；落实了朱德同志长征时期在泸定城区的住址——原堡子李子勋大院，接见群众的地点——原李子勋书房。据此，泸定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红军长征革命文物纪念馆，并与朱德同志去函，附上住地及书房照片，请求朱德同志题字。1958年5月28日，朱德同志按泸定县意见，题写了“红军长征革命文物纪念馆”馆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转泸定县人委。泸定县人委接到转来的题字后，立即将李子勋书房买下，并派人到成都将朱德题字制作成红底鎏金大匾，悬挂于房外。在室内，陈列着当年上交后剩下的二十多件革命文物。由县文化馆负责纪念馆的日常管理。

同年，在省文化部门的主持下，县委宣传部组织人员搜集、整理红军故事。1959年，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次看见红军的时候》等五个短篇组成的小册子。

2、1966年11月至1967年冬，修建红军楼。

1966年11月15日，泸定成立红军长征革命文物纪念馆筹建委员会。由州拨款2.5万元拆除泸定桥西岸观音阁，基本按其原样进行重建。取名“红军楼”。同时，抽调三名小学教师征集红军长征时期遗留在泸定县境内的实物。1967年底红军楼完工后，将新征集的文物连同原纪念馆内的文物共43件，一并陈列入红军楼内，仍由泸定县文化馆负责日常管理。

3、1977年6月至1980年9月，修建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

1984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主持召开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会议前后，泸定多次反映了泸定桥存在的问题，提出修复泸定桥头、修建陈列馆等建议。1975年5月至9

月，甘孜州文教局组织由州文化馆、泸定县文卫局、泸定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甘孜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走访革命前辈，查阅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为修建陈列馆打下了资料基础。1976年11月8日，甘孜州工委发出《关于建立泸定桥红军长征陈列室有关问题的通知》。1977年3月7日，泸定县成立修建泸定桥工程领导小组。1977年3月26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余卓群、夏义民、张得珊三同志前往泸定设计，6月破土动工。1978年6月至8月，泸定再次派人到成都、重庆、武汉、北京复制文物。1979年7月，重庆市博物馆派人支援，设计陈列总体。1980年7月开始陈列布置9月3日完工预展，接待庆祝甘孜州建州三十周年的全体代表。1981年5月29日举行陈列馆开馆剪彩仪式，公开对外开放。

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建筑面积为1080·84平方米，包括主体建筑与辅助建筑两部分。

主体建筑886.77平方米，内设门厅和五个展室，共展出图片、实物、资料二百四十多件。毛泽东同志石膏胸像陈列在门厅正中，像是大型山水画和红旗、鲜花。门厅左侧为一展室，介绍红军举行大渡河战役前的历史背景以及佯攻大树堡、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的历史情况。二、三、四展室在楼上，陈列着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遗址照片、实物、以及沙盘模型、雕塑、油画等辅助陈列品。下楼进入五展室，介绍四方面军南下途中，在泸定岚安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情况。

辅助建筑内设有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在大会议室里，陈列着张爱群、魏传统等著名书法家题写的诗词和刘继卣、王雪涛等著名国画家的中国画。

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它以充分的实物和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四日于泸定

康熙誤筆与泸定县名由来

阳 昌 伯

泸定地区在古代，曾几度设县，如汉之笮都县，晋之晋乐县，唐之嘉良县和大渡县。但均为时较短，且除嘉良县在嘉庆河坝外，其余都在沈村一带。大部分时间是设的羁縻州和实行土司制度。正式改为泸定县，则始自宣统三年（1911）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县名的来历与铁索桥有密切的关系。

康熙四十年（1701）平定“西炉”之乱后，为了巩固边防，销除运输困难，促进川藏贸易，由四川巡抚能泰奏请朝廷在大渡河上架设铁索桥。这个建议获得批准。《御制泸定碑记》载：

“巡抚能泰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崖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诏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

建桥仅用一年多时间，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动工，四十五年（1706）四月即合龙口。桥成后，由康熙取了桥名。《碑记》载：“桥成，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贸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绘图来上，深惬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顾名思义，“泸”指河，“定”是安定，表示泸河一带已安定，以矜其平西炉之功。

康熙在取桥名的时候，想把架桥的这条河的名称考证清楚，也翻了古籍，查了地图，可惜断章取义，竟至张冠李戴，把“大渡河”误为“泸水”。《碑记》载：“考《水经注》泸水源出曲罗，而未明指何地，按图志大渡河水即泸水也，大渡河源出吐番

汇番境诸水至鱼通河而合流入内地，则泸水所从来远矣”。这几句话在考证上是犯了错误的。

大渡河在秦汉时代称“沫水”。《水经注》给“沫水”写道：

“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旆牛县北，又东至越西灵道县，出蒙山南。

注：灵道县一名灵关道……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南流冲一高山，山上谷下开，水径其间，山即蒙山也。东北与青衣水合。

注：《华阳国志》曰：二水于汉嘉青衣县东合为一川，自下亦谓之青衣水，沫水又东，径开川县，故平乡也。晋初置。沫水又东，径临邛南而东出于江原县也。东入于江。”

雅砻江古称“若水”。《水经注》给“若水”写道：

“若水出蜀郡旆牛徼外，东南至关戍，为若水也。南过越西、邛都县西，直南至会无县，淹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北至朱提县西，为泸江水，又东北至犍道县入于江。

注：《益州记》曰：泸水源出岷罗，嶠下三百里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泸水有下合诸水，而总其目焉，故有泸江之名矣”。

上面两段文字，对于“沫水”和“若水”的上源、下游，名称和地理特点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康熙为了论证“大渡河即泸水也”的论点，竟把郾道元引《益州记》给“若水”（雅砻江）加的注解，搬到“沫水”（大渡河）下面，而且只截取“泸水源出岷罗”一句，下文则笼统说“汇番境诸水至鱼通河而合流入内地”不提经过的具体地点，也不提自然特点。或许因《益州记》明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等语，而大渡河到暑月，山青水秀，晴空万里，正是好渡的时候，景象迥异，因而故意含混其词。

“按图志大渡河水即泸水也”一句也是附会其词。任乃强

《西康图经地文篇》写瓦斯沟的一节说：“大清一统舆图，称此河为炉河；其于打箭炉亦书作炉，意谓打箭炉水，非谓泸水也”。由于瓦斯沟流入大渡河，地图上脉络相连，就断然把大渡河说成泸水，以支流代替主流之名也是不合逻辑的，何况“炉”与“泸”音虽同而形不同，义也有异，如何硬拉在一起呢？

考诸史籍，“大渡河”一名不止一处，如青衣江亦曾名大渡，但自唐代以后即专指今之大渡河。古代曾称过“沫水”“犍水”“铜河”，从来没有“泸水”之名。“泸水”指今雅砻江下游及金沙江会合雅砻江以后一段江流。（辞源泸水条注）亦名泸江水，三国蜀诸葛亮征南蛮尝渡此水。（辞海泸水条注）民国时代贺觉非《吟泸水诗》云：“大渡河水何处来，奔流直触众山开。当年禹迹不曾到，千百年来信口猜”自注：“大渡河水发源于松潘，《禹贡》无此水名，《汉书》及《水经注》曰沫水，后始有今名。康熙误为泸水，以其色近也，泸定桥因此得名，其实武侯所渡乃金沙江非大渡水”。

从康熙把大渡河误认为泸水并取铁索桥名为“泸定桥”后，一直沿袭二百多年，到宣统三年（1911）改土归流，复于七月四日正式布告：改陈硕、沈村、咱里为泸定县，以桥名定县名，至今也就相沿不改了。

县城设置，也是因桥而建。张培恕《泸定县乡土志历史》载：“县城今日之区域，枕东华山麓，临大渡河畔；惟史略略记载。查泸水三渡口，曰嘉庆，曰子牛，曰宜乐，泸定则未也。迄于修建铁桥，以利夷汉往来，设兵戍守，置巡检于斯，并命名泸定，自此始有城池，而渐繁荣也。民国鼎新，改行县治，委派知事，设城于斯”。又河东镇条载：“河东镇即泸定县城，原名泸定桥，亦曰桥上。海拔一千四百公尺（注：实测为1321.2米）明以前为西蕃村落，著名‘阿龙’，属察道长官司，清初从蕃音译曰‘安乐坝’，光绪年间河水冲抵东岸岩壁，已逾石龙过江，划安果为上下两部：自是以后，专称下坝为‘安乐坝’，上坝口桥

上，安乐故名失矣。”所以城区的名称，是由“阿奢”到“安乐”，由“安乐”到“桥上”，再由“桥上”到“河东镇”，由“河东镇”到“城关镇”，最后才由“城关镇”到现在的“泸桥镇”。

早年县城是四部分组成：南部羊圈沟附近称“柏杨林”，是林木葱茏、水碾发达的地区；城东到东华山麓，叫“田坝头”，有肥沃的水田，是粮食、菜果的主产区，中间建有一座古朴宽敞的“圣谕庙”。西北有“堡子”，红军长征时，朱总司令就住在堡子上的李子勋家。堡子的北边叫“营盘头”，曾建过“武官衙门”是清代驻兵和武职人员的地方；城北是“教场坝”和“船头上”。那里到冬季，大渡河水风平浪静，每年旧历十月初一至次年二月三十日的封桥期间，所有运货背子客商都在这里乘木船渡河，有时月出东山尚未止航，旧以“泸江晚渡”列为八景之一。教场坝上侧建有“川王宫”用以缅怀李冰的治水功劳；另有湖广会馆；第四部分是沿河街道，是雍正六年（1728）置巡检以后逐年修建的：由柏杨林入城至十字口为南街，街南建有城门，曰栅子门，街东建有陕西馆、贵州馆和城隍庙，建造规模宏伟；从十字口至东桥头的台子坝叫大街，是商铺集中的地方，街南有一小巷通南街，叫柯家巷。从东桥头向北至巡检府（今招待所）叫柯家街，再沿河至沙子坝称为新街。街尽头建有牌楼称三官楼，巡检府与大街之间有条小巷叫马巷，有旅店、柴市坝、娘娘庙、和文庙；从十字口向北折东叫碛门街直通江西馆。民国后期曾将柯家街和新街统一呼为宪政路，意指县府所在的街道，碛门街呼为法政路，因法院驻在江西馆，十字口至田坝呼为参政路，因县议会设在圣谕庙，马巷曾呼信义路。铁索桥西岸则称河西街。

解放后，县城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改建和扩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川藏公路沿河纵贯城西，城内有丁字形马路与之相连，车辆奔驰，昼夜不息；柏杨林变为水电、皮革、酿造、粮食、饲养、农贸、车站和文化馆基地；田坝和营盘成为党政机关

驻地和运动、医疗场所；船头建为军事、教育、和交通的中心；南街矗立着银行和影院，大街建起公司和餐厅；铁索桥古老雄伟，壮观如故，革命文物陈列馆和红军楼隔桥遥相辉映；公路侧屹立着居民新住宅，北街上建起了书店和宾馆，绝大部分旧宅换了新容。沿街商店林立，市场繁荣。道旁梧桐，翠绿成荫，中外旅游，络绎不绝。黄昏夜晚，江水滔滔，灯光闪闪，俨如大渡河畔一颗灿烂的明珠。现在城镇建设，方兴未艾，它将以矫健的步伐踏上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行列。

泸定土司历史

席珍 阳昌伯整理

一、土司制度概述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实质上是封建社会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在唐宋时代，泸定境内设了许多羁縻州，如罗岩、当马、河东、大渡、上贵、贵林等州，这是土司制度的雏形。个别地方如岚安早在宋代嘉定十五年（1222）就设过岩州安抚司。到元代才大批出现册封的土司，元世祖忽必烈率军沿大渡河谷南征大理后，将河东岩州、察道、冷碛、沈村、黎州、碉门等地置为“天全六番招讨司”并派原岩州头人高宝锡为招讨使；又把河西长河西、鱼通、宁远并作为一个宣慰司、由木雅乡色巫绒土司任宣慰使，下面在京坝境内置长河西营军万户府。到明代县境内册封的土司是沈边长官司，冷边长官司和长河西千户所。清初沈边和冷边内附后，沈边属清溪县，冷边属天全州，长河西千户所则在康熙四十年（1701）平定西炉后才恢复，改称“咱里土千户”，归明正土司管辖。这个局面维持到清宣统三年（1911）才改土归流。

封建王朝册封的土司，有的是归顺较早的部落酋长，如元代康区的色巫绒土司和岩州土司，朝廷因他们率先迎降而赐以天全六番招讨使和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的职衔；有的是随军入边，卓立军功而受到册封的；如沈边长官司和冷边长官司。

土司对封建王朝，在军事上要服从征调，每年要缴纳定额赋税，要遵守进贡制度，即十二年一大贡，六年一小贡，每次朝

觐，土司必躬行，只有小贡可托人代理。每贡必须具备方物，如花椒、药材、毡毯以及珍贵禽鸟等。朝廷则按各地所献之物来奖励他们。是否升级官职，都以朝贡的表现为断。

各土司内部组织大同小异，土司之下设“副爷”一至二人。辅助土司行事，如土司他往或染病时，可代行其职权。“司爷”一人，管理诉讼及文件。头人六至八人，按地方大小酌设，管理基层地方事务，如派遣差役，收纳租税等。

土司犹如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正如藏族民谣所说的那样“天是土司的天，地是土司的地，人是土司的人”。土司要叫老百姓服役，如背运、修建、打柴、背水等；要缴纳租税，要服兵役；土司要审理诉讼案件，衙门内设置有残酷刑具，如“吊笼”“监卡”“枷锁”等。还设置士兵，维护其辖境。各土司均信奉喇嘛教和道教，立庙拜香，籍以笼络人心。对劳动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以度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对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全不重视，交通方面，保持其崎岖僻道，设驿站、鸣炮台来通信息。教育方面，只设几个私塾来诵经读传，生产仍然是刀耕火种，有时土司间互相厮杀，更弄得民不聊生了。土司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实行了传统的闭关愚民政策，以巩固其僻远的统治地位。这和历史上“车不同轨，各自为政”的局面是相仿的。所以几百年的土司制度严重的阻碍了泸定社会的发展。

二、泸定土司历史

（一）咱里土千户《档案县志卷》载：“始祖阿交鱼通人，明朝洪武二年（1369）投诚，六年（1373）授长河西千户所职衔，老病身故，呷马蛮张承袭。青海和硕特部侵占西炉后，因势弱隐匿民间。清康熙四十年（1701）抚平后，西炉古六七立首先投诚。授咱里土千户职，颁印信号纸，（归明正土司管辖）。雍正四年（1726）古六七立身故，承袭者为古天锡，自此始姓古

氏”。据土司后代古廷献（八十岁）口述：“祖先是雅安大河边人，西炉之役，打大岗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随军进来，在鱼通彝阿梁子上门，取名古六七立，生古天锡”。按文献及口碑推断，咱里土千户共传十一代：

阿交——呷马查张——古六七——古天锡——古文远——古应福——古应洪——古荣安——古文隆——古忠德——古廷彦。

咱里土司辖地，在大渡河西岸，下自扯索坝观音岩（系余古两土司交界处，岩上现尚有方印痕迹）上至康定大藏桥。衙门设在咱里、沙湾、杵泥均有庄房。

土司之下，有四大头人：瓦斯沟杜明富，烹坝李耀廷，上田坝华福宗，杵泥刘静宜。这些都是清末到民初的头人。境内古姓本部只有三十二户，其余都是客民。

（二）冷边长官司：任乃强《西康杂异录》冷边衰亡一节载：冷边土司原系番籍，世为瓦部酋长，建部于大渡河东岸之冷碛，管辖大渡河沿岸与河西四十八寨二十六堡地方。明太祖时，酋长恶他投诚，授宣慰司职，明末纷争，所属河西寨堡，为强夷所据，次第独立，版图缩至大渡东，即泸定县佛耳岩以北岚安以南之地，共才五百户。顺治九年酋长阿撒投诚于清，始授汉姓为周”。另据《档案县志卷》氏族节载：“洪武二年，置瓦部哈工等寺都纳院院抚司，系明洪武授瓦部酋长达呷喇管辖河东上游一带地方，迄至明永乐八年，改瓦部哈工等寺都纳院院抚司为冷边长官司。顺治九年招抚投诚，冷边长官司阿撒前往投诚，缴明印信。蒙赐袍帽，谕令回边办事，撒生周长命，自是姓周”。据上述记载，冷边土司是藏族瓦部，明初册封为宜慰司，洪武二年（1369）改为院抚司，永乐八年（1410）改为冷边长官司，顺治九年（1652）内附，并授汉姓为周。《氏族》节又载其世系：

“始祖恶他，他生大穆。穆生咭什木立，立生阿松撒，撒生巫必恶苏，苏生达么，么生达呷喇撒，撒生安支，支生余纳他，他

生阿的生莫，莫生三哈，哈生阿日，日生业莫，莫生搓结，结生雍中达结，结生朗今扎吧，吧生阿撒，撒生周长命。自是始祖周氏，命生周维新，新生周至德，德生周述贤”。从始祖恶他到周长命共历十八代，均系藏族无疑。从周维新起是否仍属藏族？是值得研究的。据周土司后代周文照持其宗族名单（旧时写冥伏的宗支簿）说：“先世系河南汝南县人，传代的排行字是：子、化、有、奇、维、至、述、琳、廷、永、宗、绍、启、文。最早五代人由河南迁到湖广麻城县，到周维新时，夫妻率子女七人，由麻城迁四川，在成都、天全等地落业。最后率第七子周至德翻马鞍山进入泸定境内，维新夫妇去世后，周至德葬母于五里沟九叉树，葬父于五里沟官家坟园。周至德任冷边长官司时，衙门在大坝。至德生三子，长子周述文，才能薄弱，二子周述武，有才干，分驻冷碛，三子周述贤分驻石棉境内。至德衰老，即将长官司印信交二子周述武承袭。衙门亦由大坝迁往冷碛”。可见从周维新起，冷边土司已由汉族接替无疑问。至于周氏被册封为冷边长官司，是和他参军和立功是分不开的。任乃强《西康杂异录》载：“……嗣首周长命、周维新、周至德，于康熙两朝，累著战功，抗拒藏番，捍卫泸水，甚著劳绩。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番乱，周至德助大军攻克炉城，又扮作乞丐，西往雅砻江处，侦探番军，又招抚上下木雅、穆平、金川、绰斯甲、格什咱、白利、沃日、木拉、工共等部，众番归诚。虽有如此劳绩，清廷并未升其职衔”。刘赞廷《泸定图志》也有相同记述。说明周氏能承袭土司官位，全是由于参加清王朝发动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军职，可从大坝周妻墓碑刻：“皇清敕封校尉周至德之妻马氏安夫人之墓”一语，证明是校尉级。从周维新起共传八代：

周维新——周至德——周述武——周琳——周廷柱——周永年——周天述（宗字辈）——周朝相（号辅臣绍字辈）这八代都是承袭土司。从始祖恶他起到周长命十八代，是否都是承袭土司？

由于资料缺乏，尚不能落实。

(三) 沈边长官司：沈边上司的祖先是蒙古族。据手抄本《余氏家谱》载：“吾始祖名字端义儿，生于唐尧甲辰，少时有异志，长为佐国城第十七渡部长。子孙袭其爵。至八十九世孙铁木真，其势愈大，与宋争衡，伐宋灭金而有天下，改国号曰大元。至我祖铁木建系元成宗皇帝铁木耳之二弟也”铁木建生九子一女，招赘成十弟兄。“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红巾贼刘福通等作乱，十祖各吟诗一句，逃窜天涯，俾日后子孙相遇，各述前言，以亲骨肉之意耳”。（按红巾即红巾军，是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组织的起义军，有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等部）谱载原诗是：“我本元朝宰相家，红巾冲散入西涯。弟兄十人齐分手，风岭桥边插柳丫。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氏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千万家”。这诗说明在元末明初已改成余姓了。

本来成吉思汗一族，有一个总的姓氏叫：“奇渥温氏”（见元史·太祖纪）为何要改姓余呢？据现住沈村，并经一九八三年九月批准改为蒙古族的铁木荣（原名余荣）说：“元末明初，刘福通、朱元璋兵起，要杀尽皇族后代，为保留“奇渥温”氏根根，遂改姓“余”。余者，我也，表示我姓我，与其他张王李姓不同，改名换姓，主要为了避免当时杀身之祸”。

任乃强《西康论异录》和刘赞廷《泸定图志》均记述余氏之先世为江西吉安府人，这个关系又是怎样生起的呢？据铁木荣说：“元朝成宗皇帝即位，《铁木耳》封其弟铁木建在江西吉安府做官，一直姓奇渥温，到子孙一代，才开始姓余，这是先父口述”在其家谱内也写着“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士”有意把族别隐讳了。

余氏来泸定是明洪武二年（1369）始祖名余锡伯。是随军进川的，而且立有战功。土司后代余恒九（八十八岁住沈村）口述：先祖余锡伯从飞越岭带兵进来，先攻克化林坪，隆巴堡、沈

村、加郡、得妥等地，七年后赶走咱威亚马番王，并攻克摩岗岭磨西面及新兴等地。”《档案县志卷‘氏族’》也载：“该土司始祖余锡伯，随征沈边地方，把临御寇，勤劳有功，因授沈边百户。历传数代至余福保出师白水江有功，改沈边长官司之职，加衔指挥使，余从国、余明奇相继承袭，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克取西炉投诚，随征有功。五十一年（1712）颁给长官司印信”。说明余氏是在战争中立了功劳，而被册封为土司的。

“沈边”一语的来历，据任乃强《西康论异录》说：“沈边者，沈黎郡之边鄙也。今汉源县为汉沈黎郡，隋唐以来为黎州，沈村为黎州边微故曰“沈边”沈当读沉降之沉，惟今世清读为姓沈之沈，称其地曰沈村。”

沈边土司最初辖地较宽，康熙四十九年（1710）王德哈承授松林土千户划去大部分（在今石棉境内）留下辖地自冷碛佛耳岩以下至得妥、河西包括新兴、磨西、德威、至扯索坝观音岩为止，前后共传十九代，其顺序为：

余锡伯——余毕泽——余思山——余长寿——余初宝——余景东——余结宝——余福保——（以上明代）余期披（投诚后赐名余永忠）——余从化——余从国（从化之弟）——余明奇——余世统——余洪泽——余国玺——余尚筠——余铭恩——余志和——余应玺（系长孙承袭，死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查《余氏家谱》记至余国玺，后四代由余恒九按排行口述）。

(四) 汪土司：“原系理塘籍，康熙五十八年（1719）岳钟琪西征投诚，设正副宣抚司各一员，曰大营官，二营官。安抚司一员，曰三营官，宣抚司辖莫拉雍桑地方，安抚司辖毛垭、崇喜、瓦述诸牧部，职在捕匪，宣抚部民多为匪，安抚捕之，以此相仇。乾隆中安抚赴诉于川，川督不能理。奏请给田雅州，听其自行择地安置。赐安抚汉名汪如汉，遂世姓汪。因成都雅州清溪皆苦热，自请安置化林坪，仍赐雅州庄田，建署化林，岁给养廉俸一千两，毛垭、崇喜、瓦述诸部仍按月分班来此当差。”（任

乃强《泸定导游三十七》汪如汉以下共传六代，最后一个土司叫汪国珍，民国元年（1912）病歿。这个土司在泸定境内是一个有职无土的土司。

三、改土归流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宣统三年（1911），川滇川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南康北，放手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收缴土司印信号纸，分别派“委员”“粮员”流官。“土司稍有反抗，即用武力镇压，声势西达同普、江卡、察雅、武城一带。宣统三年（1911）春，四川保路运动风潮高涨，清廷调赵为四川总督，由边入川。从巴塘经德格、甘孜、炉霍、打箭炉至泸定。顺路将林葱、白利、卓俄、东科、明正、鱼通、咱里、冷边、沈边等九土司概予改流。并把建省设治的事情，交由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华封）处理。”（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是年七月初四日布告“……川边改设行省，名曰西康省，与内地各省一律平等，计改明正所辖之地；以鱼通、木雅、孔玉、木居城子改为康定府；冷碛、沈村、咱里改为泸定县；菩萨龙、三岩龙、墨地龙、麦地龙、八义龙、八阿龙、迷窝龙、洪坝龙、湾坝龙改为九龙县；……”当时泸定即派一设治委员。

当时泸定改流，仅收缴土司印信号纸，撤销其官职而已，对其土地、财产并未全部没收。出布告的同时附一章程：“二、土司一律取消。三、以前百姓所种之地，与土司平分。今改设县治，以种地者为业主。限三月以内向汉官处登记。此后永远为已有之地，出卖典押，与土司无涉”。（布告及章程见《九龙县图志》）说明改流是不彻底的，土司仍据有大量土地、土署、私宅，仍可坐收地租，剥削农民。其群众仍呼土司为“老爷”。到民国时代，三土司后人，都骄奢成性，腐朽堕落，家业日趋衰微，被天主教堂和地主豪绅取而代之了。

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

郑世杰

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阴历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初五）红军长征经过泸定县境，其间经过的战斗，除以“飞夺泸定桥”之役，留下光辉的史迹外，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部队，以“石门坎”和“化林”之役，打得最英勇。

瓦斯沟到沈村之间是海子山，山的西面临大渡河，全是悬崖绝壁，半崖上有一条陡峭的路，是瓦斯沟到沈村必经的小道。途中有一隘口叫“石门坎”，南可控制瓦斯沟上来的人马，北与沈村、冷碛通联，是一将挡关之地。坎后有四、五十亩平地，住户四、五家，这里可以屯兵，扼守石门坎。

驻在兴隆的敌守军袁旅，即利用这一险要地形，派营驻扎小寨子，派吴营驻海子坪，扼守石门坎。阴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得悉红军已沿河而上，前锋已到达挖角一带，于是急急忙忙调动兵力，封锁渡口木船，妄图凭借石门坎险要之地，阻止红军前进。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清晨，红军到达瓦斯沟附近后，观察了地形，掌握了敌情，然后作出果断的措施：以一小部兵力沿岩路伴攻石门坎敌人，另一部分沿瓦斯沟绕道海子口直袭小寨子，再分一部分兵力，由张院子绕后山直下海子坪。当时，普营守军在开早饭。从悬崖陡坡攀登前进的红军，突然围住了小寨子阵地，四面呐喊道：“活捉！缴枪不杀！”敌人惊慌失措，连手榴弹的保险针也来不及拔掉就乱投一阵，红军拾起来，从容不迫地抽出保险倒投过去，把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从正面攻打石门坎的红军也顺利到达了小寨子。

这时敌军退据离小寨子约四、五里的大旋头和黄土岗进行还击，战斗约持续三小时，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狼狈地向兴隆、化林方向逃窜了。

当黄土岗和大旋头战斗时，我和爹躲在斜对面梓石岩的岩窝里观看：敌军着灰色军服，在黄土岗坡上卧射，川造枪声密集；红军穿的是黑色军服，用的多是汉阳造步枪，为了节约子弹，决不乱发一枪，他们的枪声听得很清楚，进攻的人数也不多，常常是提着枪向前冲十多步后，卧下歇一歇，再向前冲，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要听到他们枪一响，黄土岗的敌人就要倒下去一个。

与石门坎、黄土岗战斗的同时，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挺进的红军，也一个接一个地向前行进，并与东岸红军遥相呼应。守宜乐渡口的敌曾向对岸打了几十枪，红军根本不予理睬，并喊话说：

“弟兄们，不必打，到红军这边来，一月发二十个大洋的饷”，敌人射击不中，自讨莫趣，随即撤走。后又用迫击炮来吊，炮弹落的地方，往往离红军很远，红军听到敌人迫击炮的响声后，立即原地坐下，等炮弹落地后，又起身前进。黄土岗战斗结束后，炮击声也随之停止了。

敌军溃退后，追击的红军大约在午后四、五点钟经过沈村堡子。后来的是做宣传工作的，有三个女宣传员，向群众宣传，据我祖父母听到的是“老人家们，你们受苦了，你们的女儿们来了，没有照顾到你们”！另外一个写标语的，在沈村堡子郑家门口灰墙上写的是“官兵平等，反对川军官长打骂士兵”！每字见方约七八市寸大；在衙门口李三长柜院墙石灰壁上写的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每字见方有一尺二、三寸大，前者是用黑墨写的，后者是用土红色写的。在郑家屋壁上用铅笔写道：“邓田不怕，二十四军逮住当鸡杀，见羊子不惹他”（羊子指杨森），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先头经过沈村堡子的是伤员，接着就一批年轻的战士，穿青色衣服，身佩短枪，多数手中都拿着

一册刊物或书本，听其谈话口音，绝大多数是江西口音，在沈村休息一会就离开了。接着是一般队伍和辎重兵，他们在村上驻下了，次日拂晓才开拔。当年轻的战士队伍走过后，国民党曾派飞机沿大渡河低飞而上，撒了些五颜六色的传单。没有投掷炸弹。以后，只有零星的红军过境，没有驻过大部队。

阴历五月初五日下午，天将黑的时间，有大队红军从冷碛经沈村去石门坎，（有的说一个团），初六日天未亮，又开转沈村往兴隆方向去了。约三天后，敌军刘元璋部才从加郡开到沈村。说明这后一批红军去石门坎一夜又折转，就是一种牵制敌人的殿后活动了。

阴历四月二十七日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是红军右路前进中的一次激烈的战斗，也是我目睹的一次英勇的战斗，这次战斗有力的策应了左路军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

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

倪德元

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我还在童年时代。

一天中午的时候，听说这里要打仗。便匆匆忙忙地随着父亲，跑到一个叫三条岗的地方躲在山洞里，同很多乡亲挤在一起。这个山洞随河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由兴隆到化林的一段路程。山洞恰好与对面的黄泥岗遥遥相对，洞的出口处有灌木林掩护住洞口，还可隐约听到对面说话或喊叫的声音。黄泥岗的西面住着两户人家，晚间，还可看到两户人家的灯火闪动。对于红军作战的片段情况，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些情况至今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红军夺下化林以后，我听到母亲、哥、姐和乡亲长辈，传颂红军当年在盐溪水 and 化林坪战斗中好多动人的故事，在我回忆里还记忆犹新。

红军还未到来之前，只见到二十四军，不分白天黑夜，断断续续地向兴隆方向开拔，路上根本见不到客商行人。这些军队沿途拉民伙背运弹药、粮米，气势凶凶，晚间砸门要火把，气氛十分紧张，好些青年男女都逃之夭夭，男的是怕被川军拉去当兵打仗，女的怕受侮辱，男女老少都很恐惧。左邻右舍纷纷离开家园去躲藏起来，家里只留下老弱病残看守家门。这两天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小小的村庄，静得可怕。

话还得从头说起，记得家乡在种完玉麦不久（阳历五月份），一天拂晓之前，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枪声，天还不见明，看不到路上有任何一点动静，心里一阵紧张过后，考虑是不是红军来了？打起仗来了！天渐渐亮明了，并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驻在化林坪的川军，晚间潜伏在黄泥岗的前哨，不知是遇到红军，还

是自我虚惊，鸣枪给自己壮胆。这些“烟枪兵”，乱放一阵枪过后，各自向化林坪方向撤走了。

大约在中午以后，我们才果真看到了红军前锋队伍，牵住马匹，担着锣鼓，三个五个一组，拉开距离，分组前进，走得很急，最多不过有二十多个。显然从兴隆到黄泥岗这一带没有受任何阻挠。半个钟头以后，在盐溪水村头，马路拐这个地方，红军遭到川军的伏击，一阵隐约的枪声以后，又听到稀疏零落的步枪声。我们又看到两个红军战士跑步回到黄泥岗向两户人家高声喊叫：“快快牵马！快！”喊出的口音不是四川音。很快，几个红军把两匹马飞快地往盐溪水方向赶去，紧接着是一个又一个的红军战士弯着腰、手提长枪，拉开较长的距离，向盐溪水化林坪方向跑几步停下来，另一个战士又冲上去，交替前进。这时红军被阻截在马路拐地方。因为从盐溪水翻过马路拐就可以仰望化林坪西边的断切面，在断面下边一块平地叫菜园子，它的下边又是一条山岗，岗上筑有碉堡。从马路拐到这条山岗，是一条顺山腰而上的斜坡路程。这是一段很难行进的独路，右上方是望不到顶的高山，左下边是悬崖深谷，红军先锋部队一翻马路拐，整个队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伏击圈内，所以遭到敌人阻截。因此战斗一打响，红军前锋暂时退守马路拐和敌军遥相对峙，敌人凭险坚守，居高临下，碉堡上的火力点完全控制住红军前进的路线。从中午到天黑，枪声时紧时疏，晚间是滂沱大雨，不时传来迫击炮的爆炸声和机枪声，分不清是敌人还是红军打的……。

当晚红军的主力部队相继赶到，听到中路被阻的情况以后，后续部队由当地老乡带路，当晚就兵分两路，从左右两边山上运动兵力。左翼从青灵山经四斗巴，越白虎咀到王家庄子和照壁山脚，直逼化林坪东北角缺口灯杆坪，这是化林坪的右后背。右翼从银厂沟翻万担坪经聂胸沟到娘娘山脚的炮靶子黄草坪，这是化林坪的左后背。一夜的艰苦跋涉，这两支英勇的红军象把长钉的铁钉，紧紧钉住化林坪敌军旅部驻地，摆下了一个大包围圈的阵

势。

化林坪背靠飞越岭，东有天然屏障照壁山，西面是高耸入云的娘娘山，北面是断切悬崖，唯有东北角一处有缺口灯杆坪。化林坪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是川藏交通险要隘口，飞越岭就有飞渡难渡之意，清初曾驻重兵把守。川军凭此有利地势妄图阻截红军前进。

一夜的山雨，敌军万万想不到，他们已在红军主力部队包围之中。天刚拂晓，中路枪声大起。左右两翼的红军战士，也相应同时攻击，骤然间，两山之巅军号齐鸣，雄壮的冲锋号音，震荡在群山之间，愤怒的枪炮声在激烈地怒吼，长途跋涉的战马在长鸣嘶叫。激战开始了，左右两翼的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化林坪猛扑。左翼的红军战士在王家莊子和灯杆坪展开了一场短暂的白刃血战，川军伤亡惨重。右翼红军战士直插敌人侧背，敌人四面受到猛击，不到一小时，就把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多数被俘，少数向汉源方向翻飞越岭逃跑了。一场激烈战斗，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了。

细雨濛濛，接连两天未停，道路泥泞难行；红军大队人马络绎不绝，不分星夜，冒雨前进。这两天听不到枪声，只见长长的红军队伍向化林方向挺进，间或听到的是军号声和马嘶声。雨后天晴，天空格外明朗。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出动，四处乱投炸弹，有些爆炸了，有些投在山谷中，有些深陷在泥土里并没爆炸。红军毫无惧色，个个头上插上树枝，行军的仍然行军，开会的照常开会，只是把躲在室外的衣服收回；还招呼老乡不要惊慌，指点着大家找地方躲藏起来，间或有红军战士用机枪仰射国民党的飞机。人们屈指计算，红军从这里经过，整整过了七天七夜。事后，人们常常眯眼回忆道：“红军不拉伕，不抓丁，不打人骂人，常用‘老板！老板’的亲切语气称呼我们，说话和气，买东西给钱，这是多么好的军队啦！”

化林坪战斗结束以后，红军大部份取道新路（民国时代新

开，由化林经山王岗炭厂到荣经）通向荣经，而人们传颂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听母亲说：“红军中还有女兵啦！就是说话听不懂，她们说要棉花搓灯芯用，她们却说‘明火’，实在听不懂，她们又拉拉我的衣服，我说这是布嘛！后来另一个红军把被雨淋湿了的棉被里的棉花撕开给我看了，才晃然弄清楚是要乾的棉花作灯芯用”。又说：“红军打仗很得行，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娃娃子，他们打了仗回来身上挂满了机柄（枪栓）在首长那里报功，那些机柄都是从川军手里缴来的。他们人小，缴的枪身太重，背不动那么多枪，所以扔掉枪身，只要枪栓。红军煮饭时，是大家都把各自通带内装的米，向锅内倒些，煮熟后各自打吃。我要做饭时请他们腾锅，他们总是叫我不要再做饭，同他们一起吃。煮饭烧用的柴，他们也要付钱。他们每一批在走之前都要来问我，有没有损坏和遗失的东西？我说没有时，他们才愉快地走了，红军真好，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

红军的故事可多啦！童年时代最爱听故事。我的家乡有一位王老先生，是书香门第之家，他成天爱和我父亲一起，天南海北，毫无题目的闲聊，我总是坐在一旁听他们聊天。一次谈到红军路过的时候，在他家住房的粉墙壁上写了很多标语，先生十分欣赏其中押韵的标语，我只记得有这么几句：“不要哭！不要哭！中央军人生路不熟。藏起谷和米，赶走牛和猪。挖断大小路，砍断电线杆。驱除川军，穷人得安舒……。”王老先生说红军里面还有不少有学问的人才哩！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回忆我的父亲

周丕炯

我的父亲周奕廷，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跟随刘伯承伯伯在四川从事革命斗争，参加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党领导下，刘伯伯亲自组织和领导的四川泸（州）顺（庆）起义，任泸州起义率团长。起义失败后，父亲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尽心竭力，直至作出牺牲，献身革命的精神是很值得我怀念和学习的。

(一)

父亲于一八九六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出生在四川省泸定县。祖父周中权在前清是一名秀才，因应试不第而在家务农。父亲字献之，在从事革命工作中，化名为铁成，排行第二。他自幼聪慧勤劳，勤奋好学，边读私塾边帮助家里从事劳动，很得祖父喜爱。

父亲幼承家教，对古文造诣较深。他在上小学期间，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曲进，满清帝制将倒的动乱年代。清廷腐朽专横和孙中山先生救国维艰的现实，深深激发了他奋发好学，立志图强的思想。辛亥革命不久，一九一二年秋，他背上干粮，步行数百里，从泸定奔赴雅安应考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入雅安中学就读。他一方面刻苦攻读，勤奋自勉；一方面关心形势，眼界开阔，接受革命思想较快。当他目睹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背叛孙中山先生革命宗旨而复辟帝制，以及北洋军阀段其瑞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后，义愤填膺，壮怀激烈，决心投笔从戎，扶正讨恶。

一九一八年春，熊克武就任四川督军，呈请孙中山先生批准，创办了正规军官学校，“四川讲武堂”，全川有一万多名爱国学生报名应考，因限于名额只收六百人。父亲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入该校骑兵科就读。他正式入学习武后，写信给祖父详细陈述了他目击现实，忧国忧民，决心从戎习武，投身革命的经过和决心。其中有两句铭志诗句：“生逢乱世当铭志，许身献之赴国难。”说明他入学后取字号为“献之”的原意，他在习武报国的思想指导下，学习刻苦，不仅军事科目成绩卓著，而且体育锻炼突出，杠架成绩特好，为全校师生所注目。也为后来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练好了体质。

一九一九年，川、滇、黔战争即将爆发，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四川讲武堂”学员提前毕业，父亲被分配到熊克武部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任排长。该团团长为刘伯承伯伯。自此，父亲在刘伯伯的直接指挥下，平时受其训练，战时听其指挥，在四川先后参加了一九二〇年的“川、滇、黔”之战；“一九二二年的一、二两军之战”和一九二三年的“讨贼之役”等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的岁月中，对刘伯伯的军事才华，指挥艺术和思想情感感染极深，对之十分敬重。父亲受刘伯伯的熏陶，执行命令坚决，作战机智勇敢，完成任务出色，先后四次受伤，累立战功，由排长升任为营长，成为刘伯伯的亲密战友和作战中的左右臂。在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涯中，他俩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九二三年，刘伯伯在大足战斗中，不幸腿部负伤，父亲奋勇抢救，悉心照料，亲自护理，直至刘伯伯伤愈后离开熊部为止。

(三)

一九二六年夏，为适应北伐战争形势，推动四川革命向前发

展,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特派刘伯承伯伯以特派员身份,回川搞军运工作,发动川军起义,响应北伐,会师武汉。并决定由杨暗公、朱德和刘伯承伯伯三人,组成四川军委,由杨任书记。当时父亲所在川军部队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二十二军),驻防泸州。父亲为团长,袁品文伯伯为该部旅长。军委和刘伯伯考虑到川军中袁品文部主要旅团干部,都曾是他在熊克武部时所带领的部属,在政治上受其教育影响较深,思想倾向革命,态度比较激进。于是特委派共产党员邓作楷为该部顾问,负责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派董庸生持其亲笔信,动员袁品文及其团长皮光泽和父亲等参加革命,进行起义。父亲亲展刘伯伯手书,回顾七、八年来,为讨救国救民,不惜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但黑暗的旧中国并未出现光明,受苦的劳动人民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明确的革命目标,而是在为军阀割据而斗争。当他受到党和刘伯伯的启发、指导之后,认识到了只有唤起民众,铲除军阀,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能救中国,于是当机立断,毅然表示响应号召,参加革命,服从领导,进行起义。并在该部积极展开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泸州防区是赖心辉部的李章甫、袁品文、陈兰亭三个混成旅合驻。李系赖心辉的亲信,一切税收均由其一人把持,深为陈、袁两部不满。遵照军委和刘伯伯指示,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和父亲等经过秘密协商准备,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毅然举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川第一次武装起义——泸州起义。起义中,他们分头将赖心辉驻龙头关的直属炮兵营和李章甫的三个团,一举全部解决。战斗中,父亲奉命主攻龙头关军事要塞。他首先率部斩关夺隘,勇往直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关隘,虽腿部受伤仍不下火线,终于赢得了首功,受到指挥部的表扬。继泸州起义后,十二月三日又爆发了顺庆起义,军委决定派刘伯伯去泸州。刘伯伯于一九二七年元月到达泸州后,立即设立

总指挥部,在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加紧对部队进行整编,父亲调任皮光泽部第一团团长,又在各部队设立了政治部,还创办了泸纳军政学校,刘伯伯亲任校长。经过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士气振奋,民心安定。不久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拉开了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序幕。当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时,刘湘即于当天发出护蒋讨伐泸顺起义军的通电,并拼凑了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和川南团阀肖镇南团队,以及贵州军阀周希成驻赤水的毛光翔师等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分路向泸州包围进攻。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刘伯伯作了紧急应变安排,他命第四路军陈兰亭部防御南岸敌人赖心辉部;五路军袁品文部防御沱江北岸之敌刘湘部;第六路军皮光泽部镇守龙头关、忠山一带制高点,防御刘文辉部。他深知父亲能攻善守,英勇果敢,遂委以重任,将龙头关军事要塞交由其团防守。

泸州东、南、北三面环水,进攻不易,只有龙头关一线无何屏障,成为敌人集中攻击之要冲。双方交火后,敌人就集中优势兵力向龙头关一线猛攻,并组织了二千多人的“敢死队”轮番突击,妄图从此打开缺口。父亲接受任务后,不辜负刘伯伯的期望,团结全体镇守官兵,在全城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奋勇反击敌人。他日夜巡查督战,那里战斗紧急,就奔向那里,和镇守军民并肩战斗,直至将敌人歼灭或击溃。大大激励了士气,使义军军威大振。敌人屡次猛攻,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固守了城防,出色完成了刘伯伯交给的镇守任务。后来敌人见强攻不下,便改施潜入诱降,秘密拉拢陈、皮二人的办法。他俩开始有所动摇,曾想出卖刘伯伯而倒戈,但遭到袁品文伯伯和父亲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刘伯伯分析了当时的险恶形势后,决定于五月十六日先行撤离泸州。行前他对袁伯伯和父亲交待任务,要他们尽力说服陈兰亭走革命道路。并命令部队从泸州撤出,沿川黔边境经鄂西到武汉集结。

刘伯伯撤离泸州后,部队鉴于外无援兵而内部粮草将尽,决

定按刘伯伯指示，乘船突围，撤出泸州到武汉去。为了保障撤离安全，父亲负责断后，他根据地形，作了周密安排，增拨给其团付巫朝汉伯伯两个排，连同政治校学员数百人，坚持扼守龙头关阵地，掩护撤退，使部队得以安全转移。但部队按计划辗转到达遵义后，不幸被贵州军阀周希成包围，强行收编。不久“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对他们鼓舞很大。父亲利用时机，继续活动旧部，待机再度起义，不料被敌人察觉。周希成遂以父亲“图谋不轨”、“共产党嫌疑分子”之罪名，撤去其团长之职，并扣押审查。这时幸亏大伯父周奕朝（父亲部队的军需官），星夜逃回四川泸定，以祖父病危为由，电告周希成火速遣反父亲回家料理后事，才使父亲逃出虎口。

父亲因受刘伯伯革命思想的熏陶较深，泸州起义前后，又受党的教育，因而，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积极向往进步，革命目标明确，故虽遭受失败，而其革命志向，并未改变。他在家短留一段时间后，即迅速外出，与重庆莲花池左派省党部取得联系，接受共产党领导，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刘文辉发现父亲意向，待他到达雅安后，便出面阻挡，先是收买拉拢，委任父亲为该部电垦司令部少校参谋，后又派去成都特别班学习。父亲对其委派貌合神离，到达成都后，按计划与莲花池总党部（负责人吴玉章）取得联系，并毅然离开刘部，接受总党部委派为汉源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受组织指示，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莲花池总党部遭到破坏后，父亲为了工作安全，遂化名为周铁城，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他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铁城者，铁心干革命，众志成城也。”刘文辉发现父亲继续坚持泸顺起义立场，不愿为其效劳，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惧怕泸州、蓬溪武装起义的重演，终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派人将父亲秘密杀害于成都。时年仅三十六岁。

（四）

父亲壮烈牺牲后，我母亲也含恨去世于雅安，二老逝世至今已五十二年了，但党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刘伯伯始终系念着他们。并对丢下的两个遗孤，我和哥哥周丕焜给与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三五年六月，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伯伯率领队伍长征，斩关夺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来到了我的家乡化林坪，竟不顾征途劳累，军机繁忙，亲自来到我们家中看望、抚慰，并亲自给二师政治部信，告诉他们父亲为革命烈士，令其优待我三姉；又以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对大伯父周群臣和三叔父周守臣全家进行保护。除留给大批白银、鸦片等物品作为对我俩和哥哥的抚恤费用外，又十分关怀地告诉大伯父，要他尽心竭力地将我培养成人，将来长大后一定去找他老人家。家乡解放后，我去重庆看望刘伯伯，泸定县第一任县长王泽民同志派军车将我送至西康省会雅安。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亲自接见我，并按国家优待革命烈士子弟的规定，将我送入雅安中学念书，培养我入团、入党，直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三中全会后，国家更加重视对革命烈士的褒奖工作，民政部给我父亲颁发了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中央“刘伯承回忆录”编写组派人来我处采访、组稿，把刘伯伯长征路过化林坪时，对革命烈士后代非常关怀、怜念的情景，写成文章，收入回忆录中，介绍给全国人民。

父亲离开我们已五十余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历了无数坎坷的道路，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烈士的后代已被国家培养成人，正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为祖国伟大的四化建设事业作贡献。父亲生前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将会更加日新月异，前途宏伟远大。父亲有知，将会对这盛世景象捋须欢笑，尽情高歌的。

袁品文事略及其泸州起义回忆

昌阳伯 宋玉春整理

一、一生事略

袁品文字其衡，别号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于泸定县泸桥镇。父亲名信安，号怀古，为人忠厚老实，热心地方公益。平素以私塾为业，收入微薄，家境贫寒。生三子一女，品文居第二，自幼身体强壮，聪颖稳健。父教以《四书》，辄能领悟，为当时泸定巡检李献廷所器重，于是助其到成都石室中学读书，品文进校后，发奋努力，刻苦攻读，名列前茅。毕业后，因学费困难，返回泸定教书。由于爱国心切，毅然舍文就武。于一九一八年赴成都，与化林周奕廷一同考入熊克武（同盟会会员，当时任四川督军、靖国军总司令）办的四川讲武学堂，奕廷学骑兵，品文学炮科，是泸定出外就学的第一批青年。结业后，分配到熊部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冲）第一团（又称支队、团长刘伯承）工作。在刘伯承同志的率领下，先后参加一九二〇年的“川滇黔之战”，一九二二年的“一二两军之战”和一九二三年的“讨贼之役”等大小战役多次，品文临战，英勇果敢，累立战功，由司务长、排长、连长、升至营长。并深受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二四年春熊克武任四川讨曹（琨）吴（佩孚）军总司令，兵败后入广东，刘伯承同志亦离去，但原有一团未撤退，由品文代理团长，率部编入四川陆军第八师陈洪范的独立旅，接任团长后，驻峨边及成都一带，以后又编入四川省长兼边防总司令赖心辉部，移防泸州，升任旅

长。一九二六年夏，北伐战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中共重庆地委在中央的指示下组织顺泸起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莲花池）召开“重庆革命军事会议”，邀请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长开会，号召“响应北伐，会师武汉”。品文为参加起义旅长之一，会上坚决表示拥护北伐，参加国民革命。一致公推刘伯承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下分六路司令，品文任第四路司令。返回泸州后，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十二月一日率部起义（经过译后文），顺庆亦于十二月三日起义。泸、顺起义，震撼整个川局，鼓舞了革命精神。但也引起了四川军阀的刻骨仇恨，刘湘和王陵基先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志士，旋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发出讨伐泸顺起义军的通电，与刘文辉、赖心辉等拼凑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分路向泸州围攻。经刘伯承同志和各将领分析当时险恶形势后，决定突围撤离泸州，以保存实力，将来再谋发展。刘伯承同志于五月十六日突围绕道西安辗转至汉口；品文部于五月二十三日随同陈兰亭、皮光泽人马顺长江东下，由水路向西、（阳）秀、（山）黔、（江）彭（水）撤退，上岸后转入川黔边境，到达贵州桐梓的七牌坊、新场一带，袁、皮两部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陈部则投杨森部。品文被解除军职，贬任为省会警察局长，改名为袁锦。任职期间曾办警士教练所，以谋再起。军阀王家烈主贵州时，品文统率兵力，已扩充到一团。（其部下参谋长黄大陆、参谋邓止戈、排长施逸成、文书李叔敬等都是共产党人。因被川、黔军阀钳制，无法施展。）抗日期间，回到成都，任泸定县省参议员，一九四七年任西昌宁属电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四八年任泸定县国大代表，一九四九年西康起义时，西昌为蒋介石西昌行辕所控制，改任为民财处处长，行辕主任贺国光逃往台湾后，品文留住西昌，迎接解放，办理移交，以后回重庆任重庆市参事室参事，一九七六年六月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二、泸州起义回忆

(以下全文系袁品文生前遗作,经宋玉春整理)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组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新纲领,由广东出兵北伐,以打倒血腥统治中国十几年的北洋军阀。当时革命高潮波及全国,四川亦卷入革命洪流中。但在这个民主革命阶段,参加进来的多属资产阶级和他们的野心分子,他们是有两面性的。一遇着自己的利害关头,或革命发生困难时就会动摇起来,不是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更不是象无产阶级那样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我们回忆一下一九二六年泸州起义失败的经过,正说明了这个道理。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以供研究近代史者参考。

(一)党在四川的军事工作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由于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山先生逝世后,由于蒋介石窃取了领导权,背叛了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就分裂为左右两派。在四川也是一样,当时设在重庆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就产生两个组织:一个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杨暗公领导的革命的省党部,设在莲花池,一般称莲花池省党部;一个是西山会议派石青阳所领导的实际上是代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省党部,设在总土地,一般称总土地省党部。在同一个名义下而实质不同的两个省党部是对立的,两派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派刘伯承军事特派员来川,配合莲花池省党部工作,推动四川军事运动。我当时任四川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属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指挥。我旅部队的基础是原熊克武总司令所属第一军第二混成旅之大部。第一军失败后,在四川军阀派系复杂的情况下,立足深感困难,每当严寒季节,士兵

无棉被棉衣御寒,伙食也无着落,难于长久维持,才被赖心辉收编为旅。所幸部队官兵,都有历史关系,上下相信,内部团结。

一九二五年,我在成都时,刘孟伉(地下党员)来我部,被我留任旅部秘书。他给我灌输一些革命的道理。当他给我阅读《三民主义》一书时,就不忍释手,同时想到未来前途,感到这样的环境哪能持久呢!要吗、是革命,杀出一条路;要吗、是垮台。这样的生活是不能长久忍受的。同年以赖部七(师长向康衡)八(师长陈能芳)两师变乱,我奉命由成都去急攻简阳,即夜占领。后来赖心辉在成都被钦禁,我乃放弃简阳退到泸州,又去攻合江,并占据黔军防地后,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驻合江时赖部陈兰亭驻富顺,刘文辉部冷寅冬师来攻富顺,陈兰亭旅长求援。我即以许剑霜营守合江,亲率全部去救富顺,我经过泸州时,适赖心辉在软禁中承认了让出泸州富顺与刘文辉。亦由成都脱身来泸,下令陈兰亭撤出富顺,调驻泸州小市,我部亦受命调兰田坝训练,而以他原属的仅有一营多人的范子英旅驻合江。我驻兰田坝不久,邓作楷(地下党员)来泸州,我以同学旧好关系,诚恳地请他帮助,聘为我部顾问,担任政治教育工作,我部亦有一个军事训练学校,我的精神讲话稿都是由他草拟。

一九二六年夏,重庆莲花池省党部派童庸生同志来泸,携有国民政府策动我在川起义的函示,又携有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童庸生同志同我两次密谈,先后分析了国内革命形势和参加革命的新使命等。我原来在第一军熊克武、但懋辛、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一谈到打倒北洋军阀,我心中就十分赞成。当即表示愿以全部力量听党的指挥。跟即派邓作楷至渝,商讨革命应如何进行等问题。当时重庆已先后到了各军代表,由党研究了策动各军起义的问题,预定了起义军的各路番号,把四川的革命形势逐渐推向高潮。

(二)泸州起义

当时赖部在泸州驻军分三部:城内为李章甫(又名李文献)

第二混成旅 小市为陈兰亭第十混成旅；大江以南距泸州五里的兰田坝为我部第四混成旅。虽形成鼎足之势，但泸州行政、财政为李章甫所把持。陈部和我部伙食每日都要去边防军司令部领。总司令部移重庆后，我们只好向征收局去领。后来说县长、局长都下乡为我们催款去了。一连十几天，每日共分几十元来维持，大家都觉得朝不保夕，尤其我内心更着急，是时北伐军事已推进到湖南，北洋军阀吴佩孚已节节失败，乃属望于多年培养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两部出兵支援。彼等亦跃跃欲试，但为革命高潮所迫而又不敢动。时驻泸州陈李两部之间的感情极为恶劣。有一次李以陈部士兵在剧院滋事而枪毙两名，其布告上谓为“匪军”士兵，陈含恨入骨。我部几经由邓作楷至渝反复商讨，最后由党决定策动起义。我到小市陈兰亭处，俟到深夜人静时，我提出解决李章甫部后起义。这话是陈隐忍多久不敢说的，我刚提出，彼此一扣即合，立即商议策划解决李章甫部。当时对李章甫估计是：一、李章甫本人是刚愎自用而多疑；有勇好斗而残毒，一般人称他为李托牛，不可轻视。要解决他的部队，必须擒贼先擒王。二、敌所据为泸州，四川谚语有“天生重庆，铁打泸州”之称。险要都为他所有。我两部一在小河之北，一在长江之南。要解决他的部队，就要使敌人无险可守，必须两部同时动作。一部占领关内钟山，使敌失去龙头关之险；一部同时占领通往小市两座城门和附近城内街道，使敌无城可守。三、泸州革命是四川一切军阀所不愿意的事情，况南岸有向与李勾结的反动的团阀肖镇南，有枪几千枝，须采取速战速决来占泸州为根据地，他纵有外援也来不及。以上三点都要结合起来，方能圆满的达成任务。这样反复筹商，感到第一条擒贼先擒王是关键而又又是困难的问题，如果第一条能办到，二三两项即可迎刃而解。十一月上旬有一天是我的生日，但两三年来都处于困难，哪里有闲做生？但陈兰亭不知从何处晓得我的生日，相约在电影院内，临时备了一席酒菜来祝贺，李章甫闻信后，也赶来参加。陈兰亭同我密商想乘机杀之。

我以为不可。因电影院在城内，是在他的部队控制之下，事发后我们走得脱、走不脱就成问题，何况我的家小都住城内将受株连，把他杀了，而他的部队仍然不能消灭，此举决非完善之计。只好另想办法决定在十二月一日起义，并派专人报告莲花沱省党部。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吃睡中都在思索解决李派的办法，甚至梦话中也说此事，幸好只有我的爱人听着。最后想出办法经与陈兰亭密商决定：由我伪称兰田坝军事训练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请李来训话，乘机擒之。但李疑心素重，请他过大江去训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必须预作思想工作。在计划决定后两三天内，我都到李章甫旅部作友好漫谈，意在先释去他疑我之心，一切计划才可实现。我特别批评了陈兰亭的疑心重，我说：“你们部队演习时，引起陈部怀疑以放步哨警戒，幸好你们坦然处之，不然会弄假成真。天地间的事，有一些是由误会而引起的。交朋友首先要认清朋友，相信朋友，决不要怀疑朋友。”李亦表同感。并也愤然批评了陈兰亭。据我当时估计，他恨我不如恨陈之深。而我与陈是第一军老同事，来往又甚亲密，李单独不能对付两部，想联络我对陈排挤攻击，又不敢说出口。今见我对陈不满，以为联我有希望了。他对我也说不上相信，但在表面上也不能不表示相信不疑。在几天漫谈的基础上，我从他的言语态度上来看已有收获。我即告知陈兰亭。我于十一月三十日由电话告知我军士训练学校：“第一期学生订于十二月一日举行毕业典礼，办点酒菜，请泸州军政首长来校训示。请客的客单第一名请李旅长，其次写总部肖参谋长、魏旅长、郭县长等，并约定在本日夜间八时送到李旅部，我在李旅部等候”。我部学校即照办，客单送来时，我早已在李的旅部，即故作偶遇之状，接过客单，亲自去请他。他稍一想，就写上“敬陪末座”四字，并约我明晨来他旅部一道去兰田坝，我立即允之。时我家住泸州城内，三十日晨即劝我父同秘书方汝康去玩泸州小河北岸名胜地“龙马潭”。临行家中现金仅四十元，即以二十元交给父亲，当时我想到前途

胜败未可逆料，若失败了，他即可作旅费远逃，余二十元由我掌握来打这一仗。同时嘱我爱人：“我明晨一早同李旅长过兰田坝，我们上船后，我借词忘记了钥匙，将派一个勤务兵来向你，这就是战争立即开始的暗号，你就可率领儿女们同这个勤务兵到小市陈兰亭家里暂避，以后就同他的家里一道。衣服用具一切决不可动，不要引起李的疑心。”到了十二月一日晨，陈兰亭派工兵营营长张缉光（与我同学）来联系今天如何协同作战。我即写一极简单的协同作战提纲三条：“1. 在八时以前，陈部即派一可靠军官到通往兰田坝的南门口，见着我同李一道走向兰田坝去，这就表明了大势已定，回报后，即派手枪兵一律便衣入城，暗中控制通往小市两座城门和附近街道。2. 我的爱人到小市，即表明李章甫已到兰田坝，胜利在握，陈部即集合全旅在河坝讲话。3. 到了我由兰田坝派专人专船来小市取留声机，这是开动暗号，即按照我写的时刻在十五分钟后，双方同时出动。陈部占领两座城门和附近街道，我部进入龙头关占领钟山。”张营长将这极简短的约定带去后，在我临行前，陈部有个与我同学的连长来问我：“今天要出什么事？”我问他从何见得？他说：“陈部喊官兵都回去。”我想这件事只有我部两个团长知道，万一泄密，全部计划将归失败。我听着这些话，头脑就有点发昏，但立刻镇静下来说：“你们把官兵喊回去很好，免得与李部发生冲突，有伤友谊。”他即不疑而去。他去后，我徘徊起来，去观，陈部保密不够，我就自投罗网；不去观，计划就会失败。我再思索，这是一场生死决斗，决不能退缩，当即决定身上藏一小枪，子弹都上好，万一泄密了，我即先打死他。然后同归于尽，遂鼓起勇气向李部走去。彼此会面后，察言观色知无其他，我虽故作镇静，但心里实在紧张。当时有意地谈一些不要紧的话，并催他一道过河，我说：“我们去迟了，主人尚没有到，有失礼貌。”他说：“我的秘书写的祝词尚未写好。”我说：“祝词只要把底稿拿去，我部可以代写。”他说：“我们去看一下。”我们

两人到秘书室去看时，见着正在写，只好等着。适逢他的参谋黎剑侯正与同事下围棋，我哪有心去看。祝词写好后，我们就乘轿向兰田坝而去。后来我听着黎剑侯在当时说：“袁平常爱棋，今天看都不看一眼，形态反常，其中有诈。”这家伙真不简单。李部部队的基础原为刘湘所属第三混成旅，黎与李同是刘湘的合川传习所的学生，假如他当着我，我想我的头脑更要发昏。由于李章甫刚愎自用，他的部属有时有话不敢讲，也不愿讲。我们两人带着只十几个人坐上一支船，上船后我就派一勤务兵回家去取钥匙。他见着我部有一团（第一团团长皮霍）在早操，一团（第二团团长张化镛）在集中打靶，他都没有怀疑。到了旅部时，泸州军政首长已先后到齐。我即派文职人员，每人交给一元，嘱他们共坐一船到北岸，然后每人分坐一船转来，使北岸船只全部集中南岸。又当着他们（指来客）写一信去催陈兰亭并取留声机，我的名字下注了几时几分的时间。派人专船而去。一切都布置好了，我即令守卫的尹熙连长把他们随行人员一齐缴械，所有泸州来的一齐扣起来。到了取留声机时间的以后十五分钟时，我即对早已集合好的官兵讲话，鲜明的树立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响起了起义的号角，鼓舞他们为革命而努力。作简单讲话后，立即命张团渡河占领钟山，我带皮团和机关枪营渡河为预备队。又令新成立的独立营向碗厂方面防御李部第二团，掩护兰田坝后方。张团渡河后，以第一营直趋钟山，时驻钟山的赖心辉总部直属的炮兵营，另有李部第三团罗腾芳在演习。第一营毫无阻碍地到达了钟山，当我率部进入龙头关，登上高坡后，对罗团前后一开火夹击，炮兵营即全部投降，罗团纷纷溃散，其中一部退入泸州城内。张团入关后，即派二营向南门外展换的李部第一团进击，经其抵抗，成相持状态。陈部亦按约定时间全部入城，巷战枪声四起，如此相持一日。入夜，李部第一团撤入城内，我派皮团所属两营入城援助陈部。至深夜，我部中校参谋吴孝思，愿去说服罗团来降，我很赞成，并嘱其努力完成，以便速战速决。吴至南门

呼喊罗腾芳团长，罗即绕城出见，并开门出降，时已拂晓。李部因罗团影响亦全部涌出大操场缴械投降。在江南岸方面，独立营出发后，主动向李部采取攻势，李部二团亦溃败，除参谋长黎剑侯率部分兵溃走外，余均缴械。我军入城后，即日成立第四路军以陈兰亭为司令，第五路军我为司令，并发出通电，贴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十二月二日入城后，对被扣押的李章甫如何处置就成为我与陈兰亭争执的问题。在战前和战争中，他口头或信函中都希望将李俘后即杀之，并借口说在战争中被击毙。入城后，他仍主张杀李以泄愤。我认为我们起义，已解决了李的部队，对李不能妄杀。况杀俘，四川尚没有先例，主张妥为扣押。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部经理处处长雷玉若曾几次去陈部，代述我的主张，最后，邓作楷也去过一次，陈仍坚持己见，并说：“若不杀，他的部队，让出泸州，开往纳溪。”这明明的就是“分家”。我想，我们起义后，四川军阀都仇恨我们，内部团结是首要的，得一个杀俘恶名是次要的。有人主张送交陈部去杀，我也没有同意。因为要心机，于以后团结不利，是恶名只有我来承担。我答应杀李，陈尚不放心，他主张派弁兵一人共同执行、并许执行后给奖两百元。于是在第三天的深夜即由连派弁兵将李押至钟山山腰的一个大坑边，以手枪击毙后，推入坑中掩埋了。

(三) 这期间党的军事部署

泸州在十二月一日起义后，与党早有联系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也于三日在顺庆（南充）起义。驱逐了师长何光烈，秦为第一路，杜为第二路。但泸州和顺庆，一在川北一在川南。为了集中兵力，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党曾预先决定：第四、五两路，在泸州起义后，即撤出泸州向顺庆集中。时革命军早已到达武汉。为了使川鄂联系起来，虽然作梗的有绥定（达县）的刘存厚部，但实力仅有枪三四千枝，其所以能生存，全靠邓（锡侯）田（頌尧）为之庇荫。在我们集中顺庆后，有把握扫清这一障碍。

从万源城口、老河口使川鄂连成一气。占有绥定、顺庆原旧制的两个府，则背靠大巴山，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是一个很理想的根据地。但泸州部队必须通过刘湘所属的罗仪三师防地——隆昌，又要通过邓锡侯所属陈书农师防地——台川潼南一带。党对此早已做了工作。已得罗仪三有条件的同意，彼借词住在重庆，隆昌军事由他的参谋长韩守斋负责，让我们通过后，泸州防地即交由他进驻，韩与我们一道跑顺庆。通过合川地区的工作，由杨暗公与刘伯承两同志到黄慕颜处，促其起义，黄为江防司令黄隐所属，又系弟兄，关系较深，脱离有犹豫。杨刘到后，乃商议决定他为副总指挥（当时刘伯承为各路总指挥）。黄慕颜即于五日起义，开赴野猫溪掩护我军渡河到顺庆集中。五日之间，在三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属，高举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旗帜，动摇了四川军阀的基础，风声所及，全川震惊。在川各军阀在大势所迫之下，也先后在四川各城市就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听着他们发出来的通电，有的还填的是泸州起义的月日（十二月一日）。

(四) 敌人向革命军四面进攻

泸州起义后，首要任务是贯彻党指示集中顺庆的计划。国民党右派的总土地省党部早就秘密派来黄季陆作陈兰亭政治部主任。陈认为泸州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杨春芳就是在泸州发展起来的，他不愿离开泸州。我部亦有开县人谢南城原由赖心辉许以县长来泸，以同乡同学关系拖着皮团，加以陈也从旁活动，使皮参与同谋，也不愿离开泸州。我当时虽为混成旅长但仅有皮霞和张化镛两个团，皮团被人拖着，使我失去一腿，虽经多方努力，终难挽回。我只有长叹，坐困被动，准备挨打。因此，党的集中计划，以陈部与皮团反对而失败。不久，罗泽州乘革命的武装力量尚未集中向顺庆进攻。当时刘伯承总指挥所指挥的秦、杜、黄三路均系初起义，还未及时改造的旧部队，军心不稳，新指挥起来，就不能象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以致在战争中失利，一、

二、三路均退出顺庆。敌人占领顺庆后，注意力又集中到泸州。赖心辉曾派但隆云、蒋晓帆来泸，以同事或同学关系勾结陈皮两部，阴谋灭我。陈皮二人得到赖心辉委为二师、三师师长的委状，并拟好就职通电，交但、蒋两人携回重庆拍发，发电之日即准备解决我和率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犹在梦中。但、蒋已上轮船待开，适逢我有要事派人到重庆，因准备东西还未齐备，乃派员到轮船上嘱其明日再开，彼等误认为事机已泄，仓皇退回部队。我军士学校校长崔华生亦参与机密者之一，以为机密已泄，恐累及自己，急来我部告密。此时我乃如梦初醒。我自泸州起义后，为严防陈部中途生变。每天除上午办公外，即到陈部，时时刻刻与他不离，陈与我虽走的道路有些分歧，从私感来说也算好的，有此一点，遂将此情直告其参谋长胡镜泉，由胡负责向陈忠告，他先谈后，我再与陈面谈。谈了一些正义之词，也谈了一些利害关系，乃将此事打消。但打消也是暂时的事，根子埋起了总有一天要发芽。我将泸州前后情况，几次报告莲花池省党部。党部以顺庆已失败，泸州内部又不安，由总指挥刘伯承同志率韩伯承、熊子骏等来泸，总指挥部即设泸州，泸州内部乃暂安定。党部亦应我所请求多派政治工作人员来泸，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一意志。随着刘总指挥陆续来泸的约有二三十人。因为政工人员数目尚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四五两路每团派一位负责政治工作，作团的政治指导员。总指挥在泸州成立后，虽注意内部的团结问题而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与陈皮形式上虽未破裂，但裂痕仍在。曾与总指挥这样密商过：为防与陈部分裂，我每天到陈部周旋，时时刻刻与他在一起，使外力不入，避免发生意外。总指挥也赞成这样与他紧密联系。在正义的前提下我与陈当面约定：李部消灭后所获大炮机枪平分，步枪谁得就为谁所有。起义后赖部大炮、李部机枪全部为我所获，照原约处理，此时我部扩大部队约一倍左右。我估计皮霍团长以升官未成，心有隐恨。为了消灭裂痕，内部调整实有必要，乃商承总指挥愿将部队

划出一半，编成两个团，拨给皮霍，改编为第六路，皮为六路司令，刘同意，嘱皮就司令职。一九二七年筹办军事政治学校，刘总指挥兼任校长，调集部队的中下级军官，招收有志的革命青年，进行六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学员已先后报到，准备开学时，在一个深夜里突然接到派去重庆购买学校文具书籍的王尔常利用与发电员黄汉臣的私人关系，秘密发来急电称：“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刘湘下令所属向泸州进军，部队即日出发。”同时党亦派人赶到泸州转告敌情，我们即积极备战。决策上是放弃泸州采取运动战呢？还是坚守泸州，待机反攻呢？在当时急待确定。总指挥部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经研究决定坚守泸州待机反攻。当时外无援兵，为啥这样决策呢？分析认为驻万县的杨森，系因统一之战（一九二五年）督理垮台，出成都，败退东下，进驻万县，但并不甘居人下，只要有会，就想夺取重庆，刘（湘）杨之间，矛盾仍很尖锐。党与杨森部早有联系，以朱德同志驻万县，策动杨森部与我部夹攻重庆，但须储备两三个月的粮食，才能久守待机。因此，在敌人未到前两三日内即收集了很多粮食储备在城内。至四月初，敌人刘湘之二十一军，刘文辉之二十四军，周西成之二十五军，赖心辉之二十二军，共约九万人，以刘湘部为主力军，潘文华、唐式遵均亲到前线指挥，泸州攻守战即将展开。由刘总指挥召集我们集会于总指挥部决定：大江南岸敌为二十五军，由陈部防守；陆路由龙头关方向来攻者为二十二军马昆山一师，二十四军冷寅冬一师由皮部防守；小河北岸为刘湘之二十一军，由我防守。时将大小河船支一齐集中长江我岸者约二三百只。大河筑有工事，龙头关利用旧有城堡防御。从历史经验来看，估计敌方进攻多从小河来，河水狭小，抢渡容易。我部即在此设有不相连的浮木，使敌船不易靠岸。又利用电影院放射机改装作探照灯，夜间不停的上下扫视，使小河一带夜间变成白昼。敌人无懈可击，又系联军各怀鬼胎，指挥不统一，因而瞻望不前，如此相持者二十几。日。敌来攻泸州时，李章甫残

部也随赖心辉来泸，李部曾派一排长潜入城内，与新编入我部的李部官兵联系，并约有暗号：“刘部抢渡小河，内部即叛变。”当危机即将爆发时，幸有一位原李部上兵马甫臣前来告密，经采取行动，将其全部破获捕杀。此后几日，总部又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因党部通知，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汉口革命政府进攻，夹攻重庆无望。总指挥提出这一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当时即说：“守泸州是因有外援，现杨森反动态度已鲜明，泸州也就无坚守的价值。杨森部离开万县，刘湘已无后顾之忧，可能以主力封锁龙头关，我们应趁其未行动之前，从龙头关方面突围而出。”当时刘总指挥指出，由陆路突围经富顺川北，所经邓、田等防地，彼可以设法通过。我说：“我有兵二团，在突围中，前方虽有危险，我愿担任前方；后方有危险，我愿担任后方。龙头关驻防敌人是冷寅冬部，在统一战役时，何金鳌师围眉州，他以一团固守，我曾去救援，在重重包围中，引他突围。加以他志在必得泸州防地。以我们的历史关系和他的意愿来看，突围是有把握的。”但当时陈皮等司令不赞成，这场会议又落空。仍决定撤退时按守泸州时原所定的路线，经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退向西、秀、黔、彭。陈兰亭司令曾派李兆南早向驻綦江穆瀛州联系过，已得其默许。总之不管川北路线也好，川南路线也好，都应立即撤退，但因陈、皮留恋泸州，并早已与赖有默契，存在幻想，以致没有实现突围。几日后，刘湘部已由小市（小河北岸）分兵一部到龙头关加强封锁。敌赖心辉部马昆山师还来信通知说：“各军已选出敢死队，明日来攻龙头关”。到了第二天，我们预备队即移向龙头关，我也亲到龙头关去严阵以待。果然在拂晓后，约组成有二千多人的敢死队，直攻至龙头关城下。时城外有一突出地，为了消灭死角，派了一个连在城外筑起工事防守。这二千多人直向此地猛扑，已发生肉搏，城上加强集中火力，杀声震天，趁势城内聂文清营即大开城门率兵冲出，敌人大溃，死伤甚众，从此不敢再犯，相持又二十几日。

（五）泸州撤退

敌人随时都没有放弃从内部攻破堡垒的阴谋。在相持中，陈部与敌方赖心辉马昆山师常有书信往来，马也曾将敌方消息通知过我们。有一天陈兰亭说：“我想欢迎马昆山进城来谈一谈，你可以报告总指挥，我决无他意。”我将此话转报后。马昆山入夜来城，被围中食宿虽简单，但也盛情招待。当时我与皮、霍均在座，饭后我等先走，留陈与马畅谈。第二日晨马始离去。几日后，陈部参谋王熙伯突来我部，适总指挥副官长叶廷鸿亦在座，王向我说：“要解围只有交出刘伯承总指挥与党派来的政工人员为质。四六两路已同意，征求你的意见。”我立即坚决表示说：“与对方进行这种协议，无异是要牺牲我们的革命领袖，你们要交人质么？我愿意把我的妻子儿女交给对方，对方不相信的是我，但这就够表示对你们的诚意了。”我又说：“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象这样做谁敢来碰我们。”当时我越说越压不住气，就气愤地站起来说：“若要交出刘总指挥与政工人员，除非我死去和我的部队被消灭。”来人虽失意而去，但应重视这一阴谋的发展。我当时仍想刘总指挥和我们一道撤退，但在强敌围攻之下，内部一有变，就会玉石俱焚。刘总指挥决定先行撤退。并于夜晚退出泸城，移往龙头关内的钟山。由我派兵一连作防卫。我问他如何安全撤退呢？他说：“早已商得封锁龙头关，驻在靠小河水道上的二十四军张仲明旅长的同意，允为掩护，保证安全。夜间我到钟山话别时：嘱我与陈、皮两部绕道川黔边境逐步退武汉。第二天拂晓，刘总指挥率韩伯城、周国淦及政工人员（留一小部在泸）等由张仲明旅掩护安全撤退。陈兰亭在泸州未撤退前的个人决策方向，一是投向赖心辉，若不可能，第二条路是投向杨森。因杨森在统一战役失败后，退至纳溪时，曾由他派了一个连保卫杨乘轮船一直冲过了刘湘的防地重庆。杨森部范绍增、杨汉城两旅在富顺又得其掩护始能在赖部生存。直到杨到万县后，

范、杨两部才自动复归杨森。陈恃此旧谊，认为投向杨森后，范绍增是他可靠的掩护人。我则一直是决心走向汉口。皮、霍与杨森无历史关系，在这紧急关头，我虽然暂不敢露出自己的意向，但估计如为形势所迫，他也会跟我一道。在这种情况下原定撤退的第一目的地，虽同是酉、秀、黔、彭，实际上已是同床异梦。刘总指挥由龙头关撤退后，不几日，马崑山部派人来城，促陈、皮就国民革命军二十二军第二、三师长职，彼等说：“就职后可以缓和一时保着泸州。”我则预料敌人必然随后宰割，把我们调离泸州。但外面封锁甚紧，而内部陈皮又另有所谋，我考虑对部队不能丢，只有再等变化，也就随和答应，他们就二、三师长，我就第四师长职。三个师长就职布告一出，我部士兵有的哭，有的骂，扯毁了布告，使我感动流泪。赖心辉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以为既得部队又得地盘，满心欢喜。但他仍要仰承刘湘喘息，遇事请示刘湘决定：泸州三部由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二等三个军各改编一部，泸州由冷寅冬师接防。赖的幻想破灭了，加以困守了四十多天，城内仅有三日之粮难再坚持，于是我们三人密商决定即夜由水道撤退。这个决策是有利又有弊。有利之点，是敌人封锁陆路和大小两河，不会料及我们可以乘船顺流而下，速度较快，既可次日到达合江下游王场，又可以越过赤水河（王场在赤水河下）免去临时渡河和被追击的危险。有弊之点，是兵力分散，指挥者只能掌握自己一船，况安妥停靠有敌所控制的轮船，可以利用来冲击我们的小木船。以当时大军围攻，必欲得我而甘心的情况下，事机危急，难有万全之策，有利之点是主导的，有弊之点可以补救。当时估计，只要上下一致，各船可以各自为战。因陈部愿撤退在前，即由他负责破坏安妥场轮船之责。决定后即各自召集营团长口传命令。我部派一营退后，掩护全军安全。由于口传命令不清，以致有多数官兵听着王场误为“碗厂”。碗厂即在泸州对河南岸。约二千人在左右在碗厂登陆，而陈部又未按照决定完成破坏轮船任务，以致轮船开出，乱冲乱撞，

有些迟撤部队也只好在碗厂登陆。登陆的这部分人为驻合江的范子英旅所阻被改编。当撤退时，我们三部都有足够船只，（前几日合理分配到各司令部和团营）。我们撤退时，小河上探照灯照样放射，使敌不疑。可以说，我部除负掩护迟退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未到达王场外，其他所失尚小。我上船出发后，船行至泸州下游约十五里的小米滩，船身搁浅在滩上，我想长江水急河宽，黑夜中有谁可晓得？难望得救，恐怕这就是我葬身之地，摸摸手枪还在，即决心不愿为敌人所俘。正当绝望时，突有一船冲到滩上，我们扒上这支船，大家来推，但一开行，船底又破，只好勉强开出，遇着一个竹杆造的船，我们又跳上他的船，船在至合江中途，遇敌人在岸上开枪，我们又舍船登陆，如此者一两处，午后即到王场登陆宿营，时在五月下旬。次日即向川黔边境前进，几日后，将到川黔边境东胜场时，遇穆溧州部扼着必要经过的大山，阻击我们。时第六路任先头部队，宿营山腰，凌晨不敢前进。我部到后，时已十时左右，以情况严重，即越六路序列前进，顺利的登上高山。穆部在狭窄的山脊要道上早有阻击布置，我部进攻作殊死战。彼部大溃，被俘者甚众，其手枪营营长是穆的干儿，绰号“黄二太子”亦被擒，我部亦死伤甚众。我们追到东胜场宿营时，对自己的死者立时安埋，伤者甚众，就无法处理，乃将大炮两门交与黄营长，托穆部医治我部伤员。又转进到贵州边境桐梓县，我与陈部住七阵溪，皮部驻新场，时在端阳，休息两天。在起行前，我函约皮霍来七阵溪会商，彼回信决心投靠周西成。回信先为陈所得，陈乃决心投杨森，决定次日出发。我请他留一天，等我到新场约皮霍一道走，彼坚决不允。第二天晨彼部即由松坎南面大山上绕过松坎而去。此时，我部在七阵溪前部队驻地召开一个营长以上的会议征求意见。当此时失去党的领导，为了保持现有力量暂靠周西成。

天主教在泸定的始末

阳 昌 伯

天主教在泸定的势力，虽然一去不复返了，但追述其传教动机和掠夺行径，对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和正确对待宗教信仰是有裨益的。

十九世纪末叶，法帝国侵占了越南，进窥我云南。经过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清廷订了屈辱的《中法条约》，连同以前订的不平等条约，法国在中国取得了通商、传教、驻领事、修铁路等特权。从此，法国势力，长驱直入西康。

法人入康后，把今甘孜州、金川、小金和云南的维西、阿敦子等地划为一个教区，以康定天主堂为主教所在地，管辖各处大小教堂。各地则纷纷套购田地，大兴土木，招揽教徒。一切大权都操在法国人手里，传教经费，除由罗马教皇发给外，大部分是法国政府补助的。帝国主义者，为了扎根于我国边远地区，巩固其侵略阵地，在康区采取了一系列阴谋手段，现就泸定冷碛、磨西、沙坝三教堂情况，分述如下：

一、建立教堂 天主教传入泸定，第一个据点，是在全县最富庶的冷碛。约在光绪五年（1879）强占朱家地方，修建教堂；现存木架楼阁一幢。1981年经防震专家鉴定，修建时间在99年以前，另据当年参加修建的木工后代（现84岁）和曾任该堂管事伍国富等回忆，都说：“建堂距今约百年。”查外人来泸传教，先是租用民房，继以蚕食方式，侵占土地、扩建教堂，因此，天主教传入冷碛，约在光绪中叶。

第二个据点是土地肥沃的磨西。清光绪二十年（1892）左右，先租汤姓房子设堂传教。有法籍教士彭某在丹巴遇害，获赠

银二千两，其弟将此银在磨西大肆套购土地。民国七年（1918）开始修建，民国十一年（1922年）完成座房和经堂，民国十五年（1926）完成钟楼。现存合金钟二口：一挂皮防医院，上铸“1922”，一挂磨西钟楼，上铸“1926”。民国十六年（1927）起，在赵家山备砖瓦，（砖上烧有“天”“上”“下”字样），喇嘛沟备木料，修建窝函子麻疯院，先建住宅，后建经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竣工，经堂正前方留有红色“1933”字样。麻疯院有围墙，墙内除房舍外，有耕作用地，面积七十多亩。建麻疯院的同时，又到新兴建一教堂，后来还开办过拉丁学校。

第三个据点是城区附近大渡河边的沙坝。光绪十五年（1889），就在那里租房传教，以后买地建房，于民国八年完成经堂。该堂兼管鱼通、沙湾两教堂。

以上各教堂，用地面积宽阔，除住宅、经堂外，有男女学舍、孤老院、菜园、花圃、仓库、鱼池、假山等。俨然当地最大的地主庄园。

二、诱骗入教 帝国主义者，趁我边区经济文化落后之状，以小恩小惠“专诱一般乡愚农民，信奉其教。其引诱之法，在政治上，则包庇犯罪，使逍遥于法外；在经济上，则以典买之田产，假教徒耕种；不习农者，或贷以资本。故一般人民趋之若鹜。入其教者，谓之教民，凡教民之婚丧词讼，均由教中神甫或主教为之主持处理，体恤庇护，无微不至。故教民有事，均多诉于主教或神甫，若有灾荒，亦请主教神甫慷慨。因此教民恃有护符，往往欺压百姓。”（杨仲华《西康纪要》280页）在我国领土内，形成一座独立王国，这不是严重干涉我国内政吗？据刘赞廷《泸定图志》统计，清末民初奉其教者达八百余户，占当时全县五千多户的百分之十六。以沙坝来说，除高、余、严、姚四家外都入了教。

三、掠夺土地 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教堂是不能在当地购置产业的。但天主堂不但不顾法纪，而且施展了极其狡猾毒辣手段，

夺取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原来大渡河两岸土地,多由当地土著和外来客民开垦。清末民初,境内三大土司势力日趋衰微,已失去对土地控制的权威,佃客们常借口系自己开垦土地,不交官租,随即自由出顶,另招佃户,从中获取代价,辗转顶佃。天主堂乘机插手,从佃户中夺取地权。凡将田地房舍顶与(转移)该堂者,均书顶约,内容所载条款为座落、四界、顶价。未则必加“一项永顶”字样。(档案县志卷·契税)表面上是“顶”(租典)实际上把主权卖给天主堂了。写成顶约就不是购买产业,法律上也敷衍得过去了。而且当时写的顶约,都由天主堂单方执存。业主无凭无据,后来“地价较原典(顶)时增加百倍以上,业主后裔或欲赎回而苦无字据,教堂亦将此税籍,秘藏不宜。虽言宣许人赎回,人亦莫知其原当界至与典额,无从言赎。依中国习惯,卖业由卖主书据,买主执存;典业由双方订立合同,分别执存。租业由租方书据,业主执存。当时似系用租典之名,行买卖之实,故业主皆无契据。教堂亦可谓狡矣”。(任乃强《泸定导游》七十三)这样不到十多年,就把泸定最肥沃的冷碛、沈村、德威、磨西、和治城附近的土地,收买为天主堂所有,有的佃与贫苦农民耕种,有的招募廉价的劳动力垦植。“据天主教堂华朗廷(主教)言:泸定已垦万余亩,收租千八百石。考其实际皆不止此”(《西康纪要》281页)请看,这是在传教呢还是在侵略我国的领土主权呢?这仍是泸定一隅,如果把整个教区统计一下,他们掠夺土地的行径,定可全面揭露出来。此外,天主堂在国内国外都有联系,信息较为灵通,解放前几年,帝国主义者眼看自己的“天堂”快保不住了,于是大量拍卖其土地,借以捞回资本,幸好人民群众的觉悟,已日渐提高,绝大多数,未受其蒙骗。只有少数利欲熏心的如冷碛土财刘邦富、陈玉才等上了当。

四、剥削地租 据当年曾任磨西天主堂管事韩友富(78岁)天主教徒王登放(92岁)等回忆:沙坝教堂购置土地,分布在上松林、磨河沟、咱里、木角沟、木杉沟、下松林、三叉沟、上下

山坝及沙坝。作物以苕麦、黄豆为主,小麦水稻次之。年收租六千多批(旧量制单位每批六斤)折合一百余石;在二区购置土地,分布在扯索、咱威、磨子沟、冷碛、沈村等大渡河两岸平原,年收租二千一百五十余石,其中稻谷一千二百石,小麦六百石;苕麦豆子三百五十石;在三区土地,分布在蔡阳、磨西、新兴一带。年收租六百三十石,以苕麦、黄豆及洋芋为主,其中仅窝沟子麻疯院内即年产三百余石。以上合计年收租二千八百八十石。以四百斤折合一石计,共合一百一十五万二千斤。民国初年,全县粮食产量按地租计算的,总计约一万四千石左右,天主堂地租占百分之二十点五七,县政府按全县地租征收田赋,每年只收到七百多石,天主堂收入却比政府收入多四倍强。这是“天主”造来的特级地主,它不但残酷地剥削了贫苦农民,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还侵夺了祖国的经济主权。

附:民国十七年左右,《西康政务委员会汇报各属外侨办理事项调查表》有关泸定部:

泸定天主堂办理传教及典买土地事项,亦设有男女学校教授天主教经文,教堂设泸定沙坝,统连教堂房舍及典买土地约值四五万元,年可收租四五百石。法籍神甫艾东。

泸定冷碛天主堂办理传教、办学、及典买田土事项,教堂设冷碛场柴市坝侧,统连教堂房舍及典买田土,约值十余万元,年可收一千余石之租,法籍神甫彭某主持。

泸定磨西天主堂办理事项如上,近更于该地附近设痲子医院。全部产业约值五、六万元,年可收租五、六百石。法籍神甫明文安主持。(《西康纪要》285页)当时天主堂产业总值已达二十一万元以上。所计租石加上痲疯病人的生产,也符合前面统计的二千八百八十石总额。

五、以慈善掩盖入侵 泸定各地天主教堂内都附设有男女学堂,孤老院,施舍些医药,痲子院收容了各地痲疯病人,地方上都称赞外国人在行“善”事。帝国主义传教分子也洋洋自夸,他

们是在给中国办“慈善”，讲“友谊”。“殊不知是借慈善”之名，掩盖其精神麻醉的实质。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我们曾同皮防医院（即麻疯院）的无家可归而留院的老病号十多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京坝余明宣说：“我是一九三〇年入院的，那时只有十二岁，现已六十四岁，入院时外国人住在汤家，病员约二十余人，都住在瓦板棚里，每天吃个绿色丸子止痛，说打针后使皮肤变黑脱壳后，病就会好，又叫吃碘酒，我针也打了，碘酒也吃了，始终无效。解放前，麻疯院死的有三百多人，跑的有三百人，留下的只有二百人左右，在院内的病人都要种菜种粮，院内每年出产十二万斤，除病人吃用外，外国人要提留一半。”件泥李建民说：“我是一九四一年入院的，现已五十六岁，当时病人有一百四十七人，以后陆续增添进来，入了院就不能出去，轻病号每天都要参加劳动，主持院务的多属意大利人，没有治好病人，十年左右就死去很多人。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后，麻疯能够治好，治好后也能够回家”。从以上两人的发言中，揭露了天主教办麻疯院的真实情况，仅作到收容与隔离，甚至对病人耕耘的果实，还要剥削一半！其手段确属残酷可耻。

至于男女学堂，招收学生，全是教民子弟，教学内容，以天主教经文为主，稍有优秀者，则授以拉丁文，灌输天主教哲理，一言一行，均以主教神甫唯命是从，妄图从思想上，俘虏他们，为帝国主义者充当奴才。其用心可谓毒矣！

另外有的神甫，道德败坏，奸污妇女，气势凌人，为所欲为之事，不胜枚举，可是这些黑幕都被所谓“慈善”掩盖了。

中国天主教神学院院长涂世华说：“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有四百多年，一直受罗马教廷和外国传教士的控制。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天主教会，已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瞭望》1984、2、20、第八期）这正是对泸定天主教的总结。宗教信仰自由，是党

的英明政策，从我们回顾旧天主教的痕迹，就可以正确对待如何信奉天主教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

泸定人民的反帝反清运动

阳 昌 伯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泸定的老百姓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了反帝反清运动，在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突出的事例有二起：

一、朱樱桃打教堂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凭借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以传教为掩护，侵入我国内地，于清光绪中叶，外国传教士窜入大渡河地区，先后在冷碛、沙坝、磨西等处，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并以恶毒手段，掠夺民房，霸占土地，诱拐教徒，扩大其侵略势力。教堂俨然成一座“独立王国”。神甫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当时流传：“洋人见官大一指”，认为是“皇亲国舅”。清王朝官吏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威势，懦弱无能，唯外人之命是从。这种情况，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更激起边区同胞的强烈愤慨。

冷碛杉木湾一带（扒湾）的土地，原归朱姓管业。法籍天主教神甫夺为己有，大兴土木、扩建教堂，强迫奉教。遭到当地爱国青年的强烈反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朱樱桃（因印堂上有一红痣，形如樱桃故名。泸定读桃为 T e r）激于义愤，约集当地青年数十人，冲进冷碛天主堂（当时称洋行），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金银分散发给贫苦农民，把神甫押至黑沟，夜宿南轩家，白日移住“孤立骨独”（地名），让穷人搬运东西。并嘲弄神甫道：“听说你们洋人生有尾巴。我们这次特地要来摸摸尾巴！”

有的插言道：“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一下！”经樱桃弟媳劝止道：“人都是一样的，哪里会有尾巴！大家不要瞎说”。有的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也出面劝阻。这样，青年们退出了天主堂，释放了神甫。但青年们的怒气并未遏止，大家纷纷议论，决不能就此罢休，要对法帝国主义在康区的势力给予全面地沉重地打击，把洋鬼子赶走。于是主动聚集在朱樱桃住地——陀陀地竖立大旗，上书“顺清灭洋”四个大字，参加聚会的约八十余人，众推朱樱桃为领袖。立即整队出发，渡过大渡河，直奔三区，打了磨西教堂，然后折转北上，打了沙坝天主堂，把堂内银钱衣物粮食等，分散给穷人。他们一鼓作气，乘胜挺进，准备直趋打箭炉捣毁天主教堂和主教驻地。当冷碛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者即驰告清政府，由于清政府对外素抱“投降屈膝”政策，即令打箭炉军粮府派武装镇压，聚义群众在前进途中，突遭冲散逮捕，现在经访问弄清姓名，当时被斩杀的有朱樱桃、朱华山、张眼皮、萧某（黄牛贩子）等，朱樱桃临刑时，毫无惧色，因判刑官写不起“朱樱 T e r”三字，改为“朱恩陶”，朱樱桃大呼：“你们杀错了！我叫朱樱 T e r”从容牺牲。诚一悲壮事也。

旧时泸定盛传“有宝”之说：如某地曾有过“一对金鸭子”“一只灵蟹”“一对金凤凰”……但结论都异口同声说：“被外国人盗走了”。初听起来好象是无稽之谈；但细审其传说动机，则与仇恨帝国主义分子的思想感情有密切的关系，以具体事物，表露其内心激情。藉“传说”以达反帝的目的，这也表达了泸定人民爱祖国、爱家乡的一颗纯朴天真的心！

二、响应保路同志会运动

宣统三年（1911）六月，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会运动，成都举行罢市、罢课、游行、示威。遭到川督赵尔丰的血腥

镇压，造成“成都血案”。各州县闻讯后，民情鼎沸，在同盟会留川成员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组织保路同志军，驰援省城。泸定于七月初二得成都通知后立即响应。由兴隆堡德字袍哥舵把子谭必芝主持，约集全县哥老成员组成同志军。揭开了大渡河谷人民的反清斗争。

原来川督赵尔丰眼看成都形势紧迫，遂密调其在康区的心腹傅华封率边军五千人进援成都，又调宁远、西昌的清军，指定集结在清溪县，共约一万人，统由傅指挥。当时川西荣经、雅安、天全、汉源各县的同志军推选罗子舟、李永忠为首领，扼守大相岭主要关隘，阻止边军进入成都。泸定是边军由康入川的必经要道。谭必芝是泸定有声望的袍哥首领，在地方上有号召力量，而且从哥老内部关系来说是罗子舟的拜兄，因此把大渡河谷阻击边军的义举交谭必芝指挥。

动员的号角吹遍四乡，人民群众纷起响应。一面筹粮筹款；一面砍掉境内的电线。并整队出发，指向打箭炉，准备直捣虎穴。行军至小升亢附近，前鋒即与边军接触，在大梯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据说几个跳神匠（旧社会借神舞蹈，用剑击额，以卜吉凶的人）冲上前去，就砍死十几个清军。其英勇气概，可以想见。终因同志军系临时组合，武器仅刀、矛、鸣火枪，而边军是用的九子枪，寡不敌众，只好边退边打。但沿途战斗激烈，在大岩窝一役，打死打伤边军一排人；冷关关一役，遭敌绕后山袭击，同志军伤亡较多；子牛一役，民房全被敌烧毁；冷碛一役，油光石渡口被敌占领，部分边军即由此渡入川。其余则由泸定桥东进。同志军在几次阻击中对边军给了应有惩罚并阻碍了边军入川的进程。这是宣统三年（1911）九月中旬到十月初的经过情况。

傅华封尾后于十月返川经泸定，实行血腥镇压，捕杀同志军首领：邱学富、李保清、贾怀仁、朱清山、杜光奎、陈永珍、范连武、朱昆山、杜华封、杨清云等十余人。在巡检衙门监狱里关了许多无辜老百姓，境内留驻二营边军驻守。由于冷碛一役，边军

损失严重，傅对冷碛恨之入骨，准备化为灰烬。他坐轿行至化林坪问道：“冷碛在哪里？”随行的人回答道：“已经过了”。他才怅然作罢。

傅华封率边军入川，沿途均遭同志军严重打击，进退维谷，只好困驻雅安，十二月二十二日（阴历冬月初五）新任四川都督尹昌衡擒斩赵尔丰后，立即派兵三千讨伐傅封华。傅见大势已去，只好宣布投降。于是雅安地区光复了。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七月尹昌衡西征平定川边，十月成立川边镇抚府，泸定正式规划设县。

袍哥在泸定的情况

李远钦 郑成基

袍哥始创于明末清初的郑成功，系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吸收的成员是九流、三教和江湖人物，以农民为主的下层社会群众。

袍哥的组织形式是依据《金台山实录》，又叫《海底》。设立公口类别分仁、义、礼、智、信五堂，又叫威、德、福、智、宜，叫作外十字。内部等级则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即大、二、三、五、六、八、九、幺牌叫作内八字。“大”即一排，设三个大爷，分别叫龙头大爷、坐堂大爷、香长大爷，二排叫圣贤二爷，三排为当家管事，五排为红旗管事和黑旗管事，六排为护律，八排叫纪纲，九排为辕门，幺排即大、小老幺。均按排次称“哥”，中缺四、七两数，因有“符四、田七”两叛徒，袍哥永忌此两排。

参加袍哥须经“引进”“保举”“恩兄”三人推荐，举行宣誓，交纳底金后才签发“札子”取得正式袍哥资格。袍哥内部有繁琐的仪式、隐晦的语言，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形成社会一种势力。

清末四川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各地，各处都有“公口”“码头”。这支强大的社会力量，由同盟会积极领导参与革命，辛亥四川保路同志军就是由同盟会领导，联络各地会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力量，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后，反清的政治目的已达，袍哥即转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口，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大量参加，被新

旧军阀、地主豪绅所利用，逐渐走向反面，一直延续到解放，最后被人民所消灭。

泸定有袍哥组织，始于清咸丰年间，首由山斗元、任礼斋、施皮挂子三人创立“泸阳公”（仁字）历任龙头大哥是山斗元——张春山——余江廷——金绍远——周焕廷，次有道士龙昆山（本姓求后改龙）等组织“永定公”（义字）原仁字姜俊臣退下来当义字舵把子，势力扩大了，大渡河两岸乡场袍哥组织，多属“永定公”发展的。历任舵把子是龙昆山——姜俊臣——杨子必——李肇初。姜俊臣又扶持李本清等组织“清和公”（礼字）历任舵把子是郑天禄——李本清——孙文斗——曹步南——李容光。民国时代，刘文辉派冉茂奎在泸定组织“会同同”由陈德滋负责，又派刘朝举组织“支那社”，前面仁、义、礼三堂人马都可参加。最后山景禄任县党部书记长时又另立礼字公口。

化林地区，由于地处川康孔道，扼飞越险关，清初即驻兵把守，人口众多，市场繁荣，为袍哥的发展奠定了自然和社会基础，因此有王虎成组织的“义和公”谭道禄的“协禄公”（均属义字公口）。其中谭道禄号号芑芝，四川潼南人，其父谭桂同经商到兴隆安家，芑芝生于光绪初年，辛亥革命时三十多岁，为全县著名的袍哥，德字舵把子，川西著名袍哥首领罗子舟和羊仁安都是他的拜弟。当四川同志军起义后，他立即响应，会同泥东陈永珍等联络汉源、荣经、泸定各地公口，汇集人马，在兴隆堰坎，杀猪盟誓，组成同志军。并率部西进，在康泸道上阻击傅华封由康驰援赵尔丰的五千边军，终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而败退，后投罗子舟，再次于汉源、雅安等地阻击傅华封，并助罗攻克嘉定。陈永珍则在蒲麦地被叛徒杀害。他们在同志会运动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渐渐从化林移到泸定桥，荣经、化林的袍哥，凭藉飞越险关，干起了抢劫来往客商勾当，逐渐从清水袍哥蜕化为浑水袍哥了。如开黑店的纪良安事

件，即浑水袍哥所为，将川北帮投宿的客商杀死后，埋在后园粪坑内，上面种上蔬菜，幸在康定川北同乡会的努力下，终于破案。又如水子地的袍哥不但在飞越岭大肆抢劫，还深入冷碛“拉肥猪”。（“肥猪”是有钱人，“母猪”是妇女，“架子”是小孩）被绑架去后，关在圈内，开出价钱，然后令其家属拿钱来取人。

解放前夕，西康省政府决定对这些袍哥武装采取“招安”措施，由西康警备司令部出面，收编成立“天、泸、荣联防大队”。当时以黄学仲、袁富祥一股枪枝人员最多，称霸于水子地到化林一带，被封为联防中队长，结果治安情况并未因此得到好转，反而使这些“职业土匪”更加公开化和合法化，横行乡里，这一带的良民百姓，更加深受其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西康起义后，黄学仲和袁富祥仍负隅顽抗，企图在化林地区组织“反共救国军。”时值化林地区灾荒，农民下种的玉米都没有，他们还向老百姓强征军粮，又委任了许多“官”。幸好解放军进军神速，当他们还来不及组建队伍时就被瓦解了，大部分武装袍哥缴械投诚，对极少数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进行了镇压。从此袍哥组织，才随着旧社会的复灭而消失了，“袍哥”两字，只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岚安事件”回忆

曹本厚

一九五〇年三月九日下午，泸定起义县长张永春叫我到县府，我走进县长室，见起义部队刘文辉的警卫团第一营长肖谦和张坐在一起低声谈话。我坐下后，张县长就急忙对我说：“今天接到康区戒严司令部（起义后康区最高军事机构）紧急通知，国民党胡宗南残部田中田被解放军击溃，约带有四个团的兵力，从青海方向逃到关外各地，现已到丹巴一带，可能在两天后将窜到康、泸两县，上级要求我们马上做好一切临战准备。二十四军傅德全团的两个连已撤过磨西。目前城区仅驻有肖营长两个连，如果我们要和敌人硬打，恐寡不敌众，势必不利。现在我和肖营长研究了一下，准备采取保持实力，见机行事，宜打则打，宜避则避的周旋战术，所以立即要把肖营长的两个连撤上岚安驻防；今天下午由一连长张志超带领全连官兵先上去，明天二连再上去”肖营长插言说：“据团部来电话说，敌人到泸定来的是张、任、陶三个团，实际人数，还未摸彻底，我们撤上岚安是有利战机。但是，听说岚安人不准我们部队上去，他们不但本身就有几百条枪，而且还在观音岩上面安置了滚木擂石”。张县长又急忙接着对我说：“据说土匪是十分凶恶的，无论走到哪里，任意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特别对进步人士和起义人员采取斩尽杀绝的残酷手段。最好你马上离开城区，随同肖营长第一连撤上岚安驻防。”另外给我安排了重要任务：第一是要说服岚安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或采取任何非法手段阻止起义部队进驻岚安；第二要饬令岚安乡公所解决部队的住宿和人粮马料问题；第三县府的重要文件全部装在一口棕箱内，已派徐自强（县府秘书室科员）送上岚

安要注意保存”。接着又走到我身旁轻声地说：“依我判断，目前我已把他们（指县党部执行委员王文良、山景祺等已镇压）软扣留了，但是我一定要想尽办法上岚安，因为在必要时，翻过马梁子就可以到天全找着解放军。你我都是师生关系，我很相信，现在又走在一条路上来了，我们就应该风雨同舟嘛。”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取了两封信递给我并说：“这一封是县府给王正荣乡长的命令，这一封是肖营长请李肇初（袍哥永定社的总大爷社长，王正荣是岚安分社社长）给王正荣写的私人信，都没有封口，等张连长来了，你们先看以下内容”。命令大意是“省府警卫团奉命到岚安临时驻防，严禁地方任何团体、民众进行阻挠，并应积极协助解决住宿和人粮马料等问题，所需粮食将来在岚安乡应交公粮项下扣除……”李肇初私信大意是“警卫团到岚安驻防，他们既不是国军，也不是解放军，而是省防军，请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午后四时，张连长进来了，经互相介绍后，肖营长以命令式的口气说：“我们部队撤上岚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和敌人打遭遇战，保住实力，伺机再攻击敌人。所以要尽最大的克制不能和岚安人起摩擦。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和老百姓发生冲突，不准乱打一枪，如有人违抗军令，可以先斩后奏，因为事关大局，要是搞麻烦了，我们就进退维谷。岚安人在民国二十四年，杀掉不少的红军，他们现有的几百支枪就是抢下红军的，可能他们以为吃饱了的时机又来了，这是他们坐井观天的估计”。张县长插言问道：“你这两连人实际人数有多少？武器装备如何？”肖营长回答说：“二百人数不完，轻重机枪几十挺，俄式步枪和短枪二百多支。只要上了岚安，就凭这点武器和岚安的地理条件，哪怕敌人是三个团再加三个团也无法攻上去。从察道上去是一将挡关的独路，从烹坝渡河上山，我们是居高临下。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爬上岚安”。张县长听得有些激动，并说：“我们只须把岚安守住一星期，天全的解放军就肯定会来判定和我们会师的”。

当天黄昏时候，我随同张连官兵一百余人由城出发，夜宿寮道，虽发现有可疑情况，但经加强防御措施后，是夜未出事。

三月十日拂晓，部队继续向岚安方向前进，大约上午九点，安全地走过了观音岩，又半小时到达心泥岗，张连长以为“险关”已过，命令全体部队在乡队副门外原地坐下休息，乡队副特意招待全体官兵吃玉米粿糍，可是乡队副王正泰本人不在场，这就引起我们疑虑。

不一会儿，从马房沟闪上来一个青年农民，走到队伍跟前，气喘喘地问：“哪个是张连长？”“就是我，什么事？”张志超应声回答。

“我叫龚有成，是乡公所的乡丁，王乡长叫我来接你们的”龚有成自我介绍地说。

“好！好！不敢当，谢谢你，你就同我们一道过去吗？”张志超感激地连声说。

“你们稍等我一会儿嘛，我到山梁子上去打个招呼，因为那里还埋伏得有几十条枪，恐怕误会了。”龚有成一边回答一边向山上走去。

龚一去就不返，大家等得不耐烦，张志超自信无问题，不等龚回来，即命队伍前进。

不料行至马房沟的横路上，即发现沟对岸山头上插有“青天白日”民团旗，沿沟站满人群，大声喊道：“不准过来，不听就要开枪”！这时张志超恍然大悟地说：“上当了”。并立即命令部队原地坐下待命，召集排长以上干部开紧急会，会上有的提出硬打，有的提出叫我和张志超徒手过沟办交涉。结果通过第二方案，我和张便鼓着勇气出发，并向对方喊话，说明我们来意。当我们一走上沟口，伪保长高国栋领着武装民团，把我们团团围住，这时张叫我掏出那两封信交给他。高转身交给伪参议员高国栋，高国栋随便看了一遍，同时露出一付凶象指着张志超骂道：“听说，你们部队最糟糕，住在烹坝时，把老百姓的鸡猪按

来杀光。简直是土匪一样，我们岚安人一致要求乡公所挡住，不准你们上来”。这时高国栋阴险地插言道：“如若一定要上来也行，因为我们不放心，你就把人分成两个组，一个机枪组，一个步枪组，机枪组先过来，步枪组后过来”。张志超毫不犹豫的答道：“可以，可以，反正我们不与地方上发生冲突，你们要枪我都交，但要把枪号登记下来，还给我打条子。”随即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按条件写上，指示副连长蔡中行照办。高国栋接过名片后，吩咐伪保长高国良把我和张志超带到乡公所休息，同时叫把那两封信交给伪乡长王正荣。我们到乡公所后，王还未来得及看完信，忽闻远处枪声四起。张十分紧张地站起来说：“坏了，一定是民团和部队打起来了，让我去看一下”。说着拔腿向门外跑，被王一把拦住并假意说：“你们现在已不能出去了，这儿人野蛮，是乱干的，我都管不住他们”。紧接着又向高国良说：“你把张连长他们引到你家去住下，这里是很不保险的，但你要端一条凳子坐在大门上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去”。我和张志超被带进新家，禁在一个漆黑的土楼下面，这屋的右下角有两个小枪眼，我们不时地探望着田野的一切动静。大致三十分钟后，枪声慢慢停下来，部队的枪支全被缴械了，看见匪徒们个个都扛着几支枪，押着被俘的官兵，关进了将军庙。计被缴轻机枪三挺，手提科尔式机枪八挺，俄式步、手枪百余支，手榴弹二百多个。

三月十一日中午，匪徒们对庙内全体官兵进行搜查，将财物衣服洗劫一空后，驱逐出境。我和张志超则于三月十二日早上，被乡保长们，一面假意安慰，一面威胁离境，我俩便化装成赶场人模样，由高国良等送出岚安到烹坝。当晚九时回泸定，目睹陶匪和伪乡保长在街上，打家劫户、四处搜捕无辜良民，见此情景，泸定非栖身之地，张即顺大渡下游逃避，我则隐藏在房东李祖富家的土库夹壁内，直到泸定彻底解放才出面。

肖营长是九月十一日早上率机枪连开赴岚安，行至观音岩，

即被匪徒利用滚木擂石和收缴张连的武器打退下来，士兵被俘、子弹被缴械，肖跃岩负伤。只带十余人向寮道方向撤退。

张县长避到太阳沟刘友寿家，意欲翻五里沟大山绕道去岚安，不料被奸人暗告，被捕。以“叛变”罪名，关押拷问。三月二十一日陶匪逃窜时，连同县府起义人员共十二人，悉被刀枪胁迫，途中逃脱三人，被枪杀四人。五月二十一日残匪在德钦县山区被解放军全部俘虏后张县长才得救。

解放后，对违反历史潮流的首恶分子王正荣、高国栋等进行了首批镇压，给予了罪有应得的惩处。

清初化林、泰宁、阜和三协兵制演变考略

张 康 林

【打箭炉地方，古属西南牦牛之地，位于蜀西边徼。有泸河（即今大渡河）自北流入炉地。明代以来，河西为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属地；河东为沈边、冷边诸土司所属，皆古之生羌地也。清顺治九年七月辛卯（1652.8.25.），泸河两岸诸土司先后缴明朝敕印降清，自始，其各属地悉隶清王朝之版图。

打箭炉地方自康熙朝始，先后设置化林、泰宁、阜和三协，皆更替而设，按顺治四年初定四川官兵经制之例，所设官兵亦皆绿营弁兵也。今据有关文献史料，就康、雍、乾三朝时期，打箭炉地方所设三协驻防官兵之经制、增裁及驻防等变动情况，考略于后。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以“打箭炉地方”泛指今康定、泸定、雅江、道孚各县属一带地方，以别于“打箭炉”（特指康定一处）。由于资料匮乏，加之笔者不敏，文中或有疏漏、舛错，亦属难免，仅供参考。】

清代，大渡河中游东岸化林一带所设的化林营，当是打箭炉地方设置驻防绿营官兵有史之始。据载：康熙三十七年六月丁巳（1698.7.21.），“改四川梁万营为化林营，设参将以下官。”（《清史稿》·圣祖本纪）其“改”字之义似有不确：按地理位置来看，化林近处有建昌镇，而梁万营远在重庆镇（《清史稿》·兵志），换言之，化林一带原本没有名曰“梁万”之营。显见，实际是移梁万营于化林，而另设为化林营。

化林营属建昌镇统辖（《御制泸定桥碑记》），建昌镇设置于重庆镇之先（《清史稿》·职官），在移梁万营而设化林营之前，建昌镇是否已先于化林一带设有营汛呢？

按清代绿营官兵之经制，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可为“营”的统领之官（《会典》卷四三），所谓“设参将以下官”，就是设立“营”制，那么，化林营应是新设之“营”了？不然。据康熙三十八年七月（1699.8.），四川提督岳升龙参揭川抚于养志疏云：“因化林营兵单汛广，移参将驻防”（《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四），这就是说，先已设有化林营，而后移参将驻防。其参将当设于“改四川梁万营为化林营”之时，可知，三十七年六月前，化林营早已设立。究竟化林营初设于何时，查诸文献史料，均无考。化林营曾于康熙二十年“增设经制守备一员，马步兵丁二百名”（《雅州府志》卷十《化林营制》），“增设”之前，按理应有驻防官兵，但此前化林营“原未定有经制官兵”（同前），故原设官兵之经制及初设化林营的时间无从稽考。【兹据康熙四十年化林营额设兵丁五百七十五名（《打箭厅志·筹边》），其中二百名为二十年所增，故拟化林营初设兵丁为三百余名，或有不准，待考。】

总而言之，化林营于康熙二十年，为守备营，至三十七年六月始为参将营。

化 林 协

“化林协”一名，在康熙五十七年后的文献史料中始有出现（《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①但其设立年代却不见记载。化林协究竟设于何时，据史料考证，应在清廷收复打箭炉之后不久。

康熙四十年八月十七日（1701.9.19.），理藩院侍郎满丕、四川提督唐希顺会题打箭炉设防事宜，疏云：“打箭炉安设兵三千名、副将一员、游击五员、守备五员、千总十员、把总二十员，令其分防。”（《打箭厅志·筹边》）“打箭炉系新复设区，必驻有官兵方可弹压”（同前），因此，清、唐二臣所请设

防事宜，清廷决然不会否之。但打箭炉地方“路险途遥”，而官兵粮饷“永远靡夫背运”，“难免迟累”（同前）。其所虑者，恐官兵因粮道险远而不能“久驻”也。于是，用将粮米“折给兵丁自行采买”的办法，来避免粮饷“运送之烦”。粮饷问题既经解决，打箭炉地方所设官兵亦可“久驻”。因此，设防之议并其付诸实施，当是无可非议了。按清代绿营官兵之建制，副将为“协”的统领之官（《会典》卷四三）。清、唐二臣所请设防事宜，概言之，就是在打箭炉设立一“协”，下辖五“营”。综上所述，可以断定，化林协设置于康熙四十年九月（1701.10.）初九日之户不久。

初九日（1701.10.10.），四川巡抚贝和 诺详奏设防疏云：“将化林营兵五百七十五名，照督臣席尔达原会题之疏，移驻打箭炉。粮米和提臣唐希顺所议，照松潘之例；折给兵丁自行采买。但夷性巨测，防范宜周，相应照督臣席尔达前议，建建昌镇标守备一员、兵丁二百名，汛守化林。又将侍郎臣满丕与提臣唐希顺驻防官兵原疏在本省兵内抽调之一千兵，今分为两营；以五百分防凤州、乌泥、若泥、嘉庆、擦道一带地方；以五百驻扎沈村，分守三渡。两营设游击二员、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二十员，兵丁月米照化林营例折给。再将提标兵八百名驻扎泥头，抚标兵三百名驻扎蜜庄，照广元之例轮班戍守，月米仍照原营估计。”（《打箭炉厅志·筹边》）

按清、唐二臣原题驻防官兵疏，是在打箭炉“长久安设兵三千名”，而实际是在河东设兵二千三百名，令其分防，“声援炉内”。这样，“既不虑兵单，而钱粮亦不致多费，更可免别省抽调之繁。”（《打箭炉厅志·筹边》）而打箭炉只移原化林营之兵五百余名驻防。据载，康熙三十九年六月（1700.7.），川陕总督席尔达曾请将化林营移驻打箭炉。《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九，九月（1700.10.），化林营参将李麟“奉文将化林营（移）打箭炉，炉蜜梗化阻挠”（沈边土司《余氏历代家谱》），“将修路

之兵丁杀死，折毁偏桥，阻截官兵”（《清圣祖实录》卷二〇一），未果。至设化林协时，官兵方始移驻，而嗣后于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702.11.1.），所移官兵与驻打箭炉之满、汉官兵，均“遵旨撤回成都”（《清圣祖实录》卷二一〇）。因此，移驻打箭炉的五百余名兵丁，不应列入化林协额兵之内。

按清代官制，守备“掌营务粮饷、充参、游中军官”（《清史稿》职官），化林既设“协”，那么，化林坪所设之“营”，无疑是中军守备营，由化林副将驻辖。沈村与岚州所设二“营”，应分别为协标左、右游击营。

关于泥头与蜜庄所设之兵，不应计作化林协之额兵兵额内。查泥头隶属清溪县，而清溪地方又“向令黎雅营中军带兵防守”（《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四），因此，泥头之兵无疑是黎雅营；蜜庄的地理位置无考，兹据“化林所属原有黎雅、峨边二营”（《清世宗实录》卷八二），推拟蜜庄之兵可能是峨边营。二营之兵既然是“轮班戍守”的抚、提标兵，就不应作为化林协之协兵计入额兵兵额内。

综上所述，化林协辖五营，实际协兵具有化林中军守备营与协标左、右二游击营之兵，共计一千二百名。黎雅、峨边二营虽隶化林协所统辖，而其额兵不愿打箭炉地方之驻防官兵，故二营之建制等情况无需穷其究竟，仅考至此，后文从略。

泰 宁 协

雍正七年六月（1729.7.），西藏第七世达赖喇嘛奉旨移往噶达城②，清廷“裁化林协，于惠远添协曰泰宁”（《西藏志》·事迹、《卫藏通志》·纪略），设兵防护。

关于设立泰宁协的时间，文献史料各载不一：《西藏志》载为雍正八年，《打箭炉志略》亦为八年，而《卫藏通志》则载于雍正六年条下。按议政大臣等议复川陕总督岳钟琪所奏噶达设防

护兵事宜，是在雍正七年六月辛丑（1729.7.23.），则噶达设泰宁协，当在此后不久，故拟雍正七年六月为设泰宁协的时间。

泰宁协自设立之时起，至乾隆四十三年三月（1778.4.）改称阜和协止，历时四十九年。其间，泰宁协的经制较为繁杂，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剖析。

第一阶段从设协至雍正十三年闰四月（1735.6.）裁兵并回驻化林止。这一时期，泰宁协总共多少额设弁兵呢？据雍正九年十一月（1731.11.）川督黄廷桂等奏称：“达赖喇嘛移座泰宁，故泰宁协原驻兵五百名，以为防护。查泰宁至打箭炉道路险阻，请再拨兵五百名，添防泰宁协，则军威震叠，与理塘、巴塘、西藏声势联络。”（《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一）是否因此就可以断言，泰宁协的额兵为一千名呢？乍读这段记载，确乎不谬；而细品其文字之含义，则不尽然。以其第一句为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达赖喇嘛移座泰宁，故（泰宁所设的）泰宁协原驻兵五百名，以为防护。

二、达赖喇嘛移座泰宁，故泰宁协（设在泰宁的泰宁营）原驻兵五百名，以为防护。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设兵一千名，而后者是个未知数。第二句所记，拨兵五百名，是添防“泰宁协”，而不特言添防“泰宁”，这就暗示了泰宁协除在泰宁城设兵五百名外，在泰宁城之外的附近地方，尚没有驻防官兵。所以，按第二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泰宁协在雍正九年添兵之前，有多少原驻兵呢？

据雍正七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所奏噶达设防护兵事宜云：“噶达建造庙宇，移驻达赖喇嘛，守护之兵，殊关紧要。查化林协额兵现有一千名，请以三百名留驻化林坪，另设都司一员，带领千总一员、把总二员，以资弹压。以二百名移驻打箭炉，令化林守备带领把总一员分防。以五百名移驻噶达，令化林副将带领

把总二员，再添设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一员，前往防护。至噶达之外，雅砻江上中下三渡俱属要隘，请设千总二员，各带兵一百名，分守上下二渡；设守备一员，带兵二百名，防守中渡。又，噶达之西吹音堡，亦系雅砻江渡口，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分防。”（《清世宗实录》卷八二）化林都司营与阜和守备营（打箭炉）之兵五百名非属防护之兵，故不当计入泰宁协额兵兵额内。如此，添防之前，噶达城设泰宁中军都司营有兵五百名；泰宁（即噶达）以外之雅砻江三渡设兵四百名；泰宁西之吹音堡设兵一百名。而实际上泰宁协之额兵非仅此一千名，据载：“化林协原设马步战守兵一千名，驻化林坪。雍正八年以副将带兵五百名，移驻噶达城。改为泰宁协。又招募新兵八百名，拨添协标一百名，共兵六百名。别于中渡添设德靖营，设守备一员，兵四百名。灵雀寺添设宁安营，设守备一员，兵四百名。”（《打箭炉志略》·营汛）由此可知，德营之兵即雅砻江三渡所设之兵，宁营与拨添协标之兵，应在雍正九年所添之兵。显而易见，吹音堡之兵一百名，《打箭炉志略》当是漏记无疑。

关于吹音堡兵，理应在泰宁协所辖之三营内，理由是：泰营共兵六百名，而至雍正九年添防前，尚只有五百名，吹兵设于七年，故不在泰营额兵内。德营在泰宁西南之外约一百二十里（《西藏志》·程站、《雅江县图志》·道路），又与吹兵同时设立、虽均为雅砻江渡口，然吹兵显然不在德营额兵内。宁营在泰宁西北之外约一百一十里（《道孚县图志》·道路）；所有额兵四百名均设于雍正九年，而吹音堡兵设立在先，虽均处泰宁之西，吹兵显然亦在宁营额兵之外。尽管如此，吹兵设于泰协设立之同时，既是为防护达赖喇嘛所设，又处泰宁附近之西，以理而推，当属泰协所辖。

此外，雍正元年三月（1723.4.），清廷曾准“将分驻崑州之化林协守备移驻中渡，建立土城。拨把总一员、兵二百名，随往分防。”（《清世宗实录》卷五）是以化林协原设额兵一千二百

名，而至雍正七年六月设泰宁协时，“化林协额兵现有一千名。”按中渡原驻兵，至设立后，是否有所变动，不见记载。据前面引用的文献史料所载，雅鲁江三渡所设德靖营，共兵四百名，都是招募的“新兵”这就排除了以中渡原驻兵添兵而设德靖营的可能。当然，更不可能在泰、宁二营，这一点，前面的分析已经充分得到证明。那么，吹兵是否中渡原驻兵吗？显然不是：吹兵一百名，系新设之兵。如是拨中渡原驻兵一百名设于吹音堡，且不说余下一百名作何处置（决然不会拨添协标），还不如按兵不动，另添兵而设德营，岂不更加省事？

对于中渡原驻兵，可作如下两种假设：

一、为设防护之兵，在设泰宁协之前，已将中渡原驻兵移驻泰宁。嗣后，泰宁设协，而中渡兵已作为泰宁原驻兵论；故可不在于泰宁协额兵内。关于这一点，鉴于文献史料无载，存疑待考。

二、仍驻防中渡所建土城。按中渡河口“系通西藏要隘，不可无弹压。”（《清世宗实录》卷五）所以“建立土城”，设兵防护（同前），以为长久之策。而德靖营之兵，仅属暂时“为防护达赖喇嘛而设”（《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是应急之举。所以，雍正七年设德靖营兵时，中渡原驻兵很可能并未移驻别处，仍驻防中渡土城。既是长久之兵，当然也就不属德靖营统辖了。尽管如此，中渡原驻兵可以被视为具有“防护”意味之兵，因而也有可能属泰宁协暂为统辖。

综述之，泰宁协在第一阶段共辖泰宁、德靖、宁安、吹音堡及中渡原驻兵，共计一千七百名。

第二阶段是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泰宁协司驻扎化林起，至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改设阜和协止。

先看泰宁协标左、右二都司营的经制情况：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泰宁副将带兵七百名，由泰宁回驻化林，与原副驻扎化林坪之化林都司营兵三百名，分设协标左、右二都司营（《打箭炉志略》：营汛、《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二营共“设都司二

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协标左营都司驻扎化林坪；协标右营都司先驻泸定桥，乾隆九年始移驻清溪（详后文）。

再看阜和营。阜和营驻打箭炉，在第二阶段中，其经制几经更改。设营之初为守备营，领兵二百名。十三年闰四月添千总一员、兵一百名（《清世宗实录》卷八二、卷一五五），改守备营为都司营（《打箭炉志略》：营汛）。乾隆九年添兵二百名，改都司营为游击营，添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三员（同前、《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四）。至乾隆四十三年，阜和游击营之额兵仍九年之数，共计七百名。

这一时期，除泰宁协辖三营之兵外，打箭炉地方应另驻有经制官兵。按雍正十三年夏四月（1735.5.），西藏第七世达赖喇嘛奉旨回驻西藏（《西藏志》、事迹、《卫藏通志》纪略），闰四月，清廷将泰宁、宁安、德靖“三营弁兵俱行裁撤”（《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吹音堡兵及中渡原驻兵既然不在上述三营，显然不属裁撤之兵。因此，这三百名可能仍旧驻防原处。

综述之，泰宁协自雍正十三年闰四月起，设额兵一千三百名，而至乾隆九年以后，共有额兵一千七百名。此外，打箭炉地方尚有均驻之经制官兵三百名。（详文末附表）

阜 和 协

阜和协设于乾隆四十三年三月（1778.4.），准确的说，阜和协并非新设，而是由泰宁协移改而成，其官兵经制也并无大变更。据同年二月四川总督文绶等咨改阜和，泰宁营制事宜四款内称：“阜和改营为协，泰宁改协为营，应将原设泰宁协副将改为阜和协副将，泰宁协左营都司改为阜和协左营都司，俱移驻打箭炉。其原设阜和营千把，外委及额兵七百名，悉归协标。再于原设泰宁协左营额兵内拨给阜和协左营十七名。原驻清溪之泰宁

协右营都司改为阜和协右营都司，仍额兵三百名。阜和左右两营定额兵共一千十七名。至泰宁改协为营，应将原驻炉城之阜和营游击改为泰宁营游击，原设阜和营守备改为泰宁营中军守备，同移化林坪，求阜协，定额兵共六百八十三名，各营千、把、外委等分驻汛地各仍其旧。”（《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五二）可知：阜和协所辖三营，唯各营的名称更改，而其驻防及额兵兵额，仍与泰宁协同。至于营制，也只是将阜和游击营与泰宁协标左都司营对换。其官制，除阜营与泰左营的经制官员互相移换外，只将原阜营移驻原泰左营之守备改为中军守备，其余仍照泰协之官制，照旧设立。

关于阜和协各营的驻防营汛，需在此略加说明。阜和协标左都司营即原泰协左营，勿庸置疑，阜左营之额兵实则是原阜和游击营兵，故驻打箭炉。而阜和协标右都司营及泰宁游击营，其额兵实则是原泰右营及泰左营。雍正十三年，二营分别驻防泸定桥及化林坪，而至乾隆八年末，始将泰右营移驻清溪（《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四）。回溯康熙四十年初设化林协时，共设三营：化林中军守备营驻防化林坪，沈村设一营，岚州诸处设一营（姑且暂分别称为“沈村营”与“岚州营”）。化林营既为中军守备营，则沈村、岚州二营应为化林协之协标左、右二营。但其孰为左营，孰为右营，均不见载。按雍正七年设立泰宁协时，其协标右营都司驻防泸定桥，而康熙四十五年六月辛亥（1706.8.3），因泸定铁索桥建成而设泸定桥汛时，“移化林营沈村防守千总③一员、兵一百名镇守。”（《清圣祖实录》卷二二、《清史稿》·圣祖本纪）既然移沈村营之兵防守泸定桥汛，是否就可以据此而认为沈村营为化林协标右游击营呢？尚不能断言。按泸河向有煮坝、子牛、沈村三渡口，皆“入打箭炉所经之道”（《御制泸定桥碑记》），而各渡又有诸小渡口，是故，沈村、岚州二营均设兵五百名以为防守之计。而至泸定铁索桥告竣，始成入炉之大道；因而诸处之大小渡口也随之多有废弃，凡天全侧门诸处及黎雅一

路，也多取道泸定桥入炉。至雍正元年三月，将岚州营之兵二百名移驻雅砻江中渡，以所余之兵三百名分防岚州诸处，似有不敷。按彼时所以设立化林协，原是为声援防护打箭炉，而康熙三十八年时又屡以岚州、嘉庆诸处的兵事为患，所以，防守之兵亦属紧要。及至桥成，以理推之，岚州诸处当增兵添防而不致裁汰弁兵。所以，四十五年拨沈村营之兵镇守泸定桥汛，实则应视为添设岚州营。因此，可推而知之，沈村营应为化协左游击营，岚州营应为化协右游击营。否则，至雍正十三年设泰宁协标二营时，其左、右位置竟相互参错，于理不符，于史实不合了。④

阜和协标右都司营即泰协右营，乾隆八年十一月（1743.12.），“将原驻泸定桥之协标其右营都司带领该营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额兵二百名，再于泰宁存城兵内拨兵一百名，移驻清溪。”（《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四）。据这段文字记载可知，泰右营原设额兵只有二百名，那么，泰左营原设额兵应为八百名，所谓“泰宁存城兵”，应指雍正七年留驻化林坪之兵三百名，其理由是：据载，“阜和营既清添兵，则炉地门户严密，相距泰宁声援密通，其中间之泸定桥不必多兵防守”（《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四），泸定桥既处于“炉地”与“泰宁”之“中间”，按地理位置而论，当是指化林而非指泰宁（噶达）。所谓“泰宁存城兵”也就是泰宁协所属的化林坪原驻之兵。以泰宁（噶达）之兵而论，只有吹音堡兵一百名，而“泰宁存城兵”，既言“内”，当不止一百名；假设中渡原驻兵已移驻噶达，那么，共有戍三百名，似尚可言“内拨”，但如果这项兵额作为“存城兵”而论，则泰协之额兵应共计一千一百名，于史实不符。泰右营虽拨添“泰宁存城兵”一百名移驻清溪，而至改设阜和协时，泰协左、右二营之额兵，总共仍旧为一千名。可见，“泰宁存城兵”无疑指的是泰左营中原驻化林坪之兵三百名。“存城”者，“留驻”之别义也。

泰宁营即阜和营，始设于雍正七年时，按康熙四十年设化林

协时，打箭炉曾驻满、汉官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五名（《清圣祖实录》卷二〇二、《打箭厅志》·筹边），这项官兵原属征剿之兵而非“长久安设兵”。既然“河东共有二千三百名（兵）分防，声援炉内”，则打箭炉也就无须再设驻防之节制官兵。所以，自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702.11.1.）打箭炉所驻满、汉官兵均“遵旨撤回成都”（《清圣祖实录》卷二一〇）后，至阜和营设立之前，这一段时间内，打箭炉应无驻防之节制官兵。

综述之，阜和协设立之时，共辖三营，额兵为一千七百名。

①据沈边土司《余氏历代家谱》记载：“（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奉文将化林营（移）打箭炉，炉蛮梗化阻挠，（余）明奇奉李参将（麟）调领土兵首先过河，招安三渡并村堡彝民，随招咱哩（土司）古六七力，迎缴印信三颗，转呈化林协，呈报各宪在案。”则康熙三十九年之前已有化林协，所载与其他文献史料有异（见正文）。按三十八年四月初十日（1699.5.9.）四川提督岳升龙曾“密遣臣标中营守备李成瑛，带领官兵五百名，前往化林营贴防。”（《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四）又，三十九年，四川提督唐希顺撤各路兵赴化林”（《清史稿》·列传四十四、唐希顺）。《家谱》所言“化林协”，或设于三十八年，或设于三十九年，但毕竟是为剿抚打箭炉而临时设立之协，与四十年正式设协不可同一而论。

②西藏第七世达赖喇嘛奉旨移驻噶达城，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自前藏起程移驻，八年乃至噶达（《清世宗实录》卷七五、卷七六、卷九三、《西藏志》·事迹，《卫藏通志》·纪略）。

③沈村防守千总在沈村营而不在化林营，并沈村营应属化林协辖而不属化林营辖。此处所言“化林营沈村防守千总”，或因化林营有副将驻扎之故。

④雍正十三年，泰安协副将所率回驻化林之兵七百名，其五百名应仍驻沈村，防守三渡；彼时打箭炉既已设阜和营，有兵三百名，则泸定桥及岚州等处无须多设成兵。设兵二百名于泸桥及岚

州等处，已足防守。因此，沈村与化林坪一带仍为协标左营之营汛，泸桥及岚州等处仍设协标右营。

附表说明：

“经制”栏内按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与额兵统计。其额外外委栏，因史无载，而按经制应设，故以“？”记。表中数字因史料不足，虽列出，但仅作参考。凡“中军者”者于表内标“中”字以示之。

乾隆八年以后	协标左都司营	(驻化林坪)		1	1	2	5	4	?	700
	协标右都司营	(驻清溪)	1		1	1	2	2	?	300
	卓和游击营	(驻打箭炉)		1	中1	2	4	4	?	700
外设	中渡及吹音堡原驻兵				1	1	1			300
共	计		1	1	3	5	6	12	?	2,000
乾隆四十三年	卓和协	协标左都司营			1	1	2	4	?	717
	协标右都司营	(驻清溪)	1		1	1	1	2	?	300
	泰宁游击营	(驻化林坪)		1	中1	2	5	4	?	683
外设	中渡及吹音堡原驻兵				1	1	1			300
共	计		1	1	2	4	6	12	?	2,000

附表:

康雍乾三朝三协驻防绿营官兵径制一览表

单位: 员、名

时 间	名	称	经											制
			协 副	营			汛				委	额 兵		
				游	都	守	千	把	外					
康熙四十 五年	化 林 协	化林中军守备营	1			中1	1	2	2	?	200			
		协标左游击营		1	1	1	2	10	5	?	500			
		协标右游击营		1		1	2	10	5	?	500			
		协标右游击营		1		3	5	22	12	?	1,200			
		共		1	2									
雍正七年 起至雍正 十三年	泰 宁 协	泰宁中军都司营	1		中1	1	3	2	3	?	600			
		德靖守备营				1	2	4	2	?	400			
		宁安守备营				1	2	4	2	?	400			
		吹音堡驻兵					1				100			
		(驻泰宁吹音堡)												
		(一)				1		1			200			
		中渡原驻兵												
		化林都司营			1	1	1	2	2	?	300			
		卓和守备营				1	1	1	2	?	200			
		外 设												
共	计	1	2	6	10	14	11	?	2,200					

李含章与长春堂

范述方

清末民初，在大渡河畔的泸定县德威乡奎武村，有一所遐迹闻名的中医药行——长春堂，它的创始人李含章先生，生于清道光八年，卒于民国四年（一八二九——一九一五年）。他自幼天资聪明，六岁入学馆，勤奋好学，十六岁习医拜同姓老中医为师，十九岁为照顾蒙冤在狱的父亲（其父李金元被关押在雅安监狱），曾在雅州府衙门外设摊行医、写字谋生。其父出狱后，含章继续在雅钻研医术，立志救死扶伤以了夙愿。适逢新都名医杨西山先生到雅安行医治病，含章闻知西山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决心向其求教。从此在杨先生的精心指教下，夜以继日的勤奋学习，苦研岐黄仲景之书，三年后，自觉心胸广阔，医理熟悉。五年期满，先生嘱其出师自立，并赠以“长春堂”扁额。此后，含章即在雅安开设一药店，治病售药，医术益精，不久即驰名于雅安城乡。

人情思乡，叶落归根，含章二十七岁回到故乡——奎武村，开设长春堂经营药行，行医诊病，培养学徒。

长春堂开业于清咸丰三年（1854年），药行有大小房号四十余间。内设药房、诊病治疗室，还设有为重病号及慢性病治疗住宿的床位；以及加工膏、丸、散、丹和炮制药物的作坊。带有徒弟十余人，其中有学医理、药理和炮制加工的，以范代禄、余炳芝，董药铺等最为出类拔萃。远近病患皆来就医，因此名震一时。

先生以治温热时疫见长，用药慎重，渐化温良。治衰弱年老

之病，多用血肉之品为引，佐以温摄垫下之味，如猪腰、羊肾、紫河车、黑狗鞭、鹿茸、龟胶、核桃肉、桑椹等均为喜用之药。他说：“在论病判别虚实之间，加减化裁之际，要学古而不泥古，要机巧灵变，对症下药。积多年磨练之功夫，乃平日百练苦攻，病人只缘其方立收既成之效。先生在“四诊”中“切”诊功夫最深，对病人生死判断明了。昔年，兴隆村杨副爷之四公子患病半年之久，来求李先生医治。见其面容焦枯无华，气短懒言。先生切其脉象曰：“汝心脉抵指而亢，肝脉如循长竿末梢而弦，脾胃脉软滑乏神，沉取滞而利。据脉象设之是淫欲过度，耗损肾精，肾元之气大衰，肝阴之气暗耗，耗损故运化之气衰而不振，所以精血大散。时值冬令，诸阳内潜，又可幸免一时，但愁春来风动之时，难保无虞，斯时阳越水枯，木析土崩，何可挡之？纵有妙手灵药，亦将束手无策矣。杨副爷父子听之赫然曰：“恳求先生赐良方、搭救儿命。”于是先生沉思良久拟方如下：西洋参、黑故子、潼蒺藜、桑椹、巴戟、制龟板、茯苓、兔丝子、白术、法夏、枣皮、羊肾、黑狗鞭。嘱其在先生家住两月，经先生用心治疗两月后，病痊愈告辞归家。先生送出门外曰：、少君。王道无近功，回去需要再服药百剂，并戒忌半年不与妻同居，二年以后可保长寿”。那知他归家不到一月，色淫发作与妻同居，不到半年病重，先生切其脉大惊曰：“脉已绝，油尽灯自灭矣，不出三日必亡”，果不出先生所断，三日午时杨君一命呜呼。

又如，泸定冷顶天星宫刘邦富久患不寐之症，形瘦肉枯，头晕脑眩，神思恍惚，便秘瘦黄，时觉耳鸣。李先生嘱其大徒弟范代禄诊治。范切其脉曰：“沉滑而有力，沉为气，滑为痰，气郁痰阻，致使脾气不升，累及心气，迷离多端！阅前服诸药，大多安神养心，滋阳敛阴之味，愈使浊痰胶固，方中虽有二陈、六君方，未辨痰之所生由气郁，郁久生热，痰液成痰，故二陈不能解郁除热、反失于偏补，偏燥所以无验。范代禄先生乃用仲景半夏泻心汤加减化裁之：法夏、枯苓、黄莲、生姜、莲心、泡参、连

翅、白芥子、竹茹、甘草、连服四剂而愈。刘为感谢李先生及弟子，赠送“起死回生”扁额一幅悬于中堂。庆喜之日，李先生对众弟子曰：“得英才，而教之，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矣！望吾弟子应看大师兄那样精益求精。”又曰：人，生死乃自然界之规律，余何指判焉？不过常潜心脉理之根源也。自古先圣有脉理反复论述，毫不含糊。仲景，频溯脉学之书论证每以脉学之诀点睛而用。四诊之中，幽微隐秘，莫过于审脉，庸医者，认其幽微难测，多忽而不深研，手虽按脉，错综复杂之症，何以得其泾渭，须精熟脉学，脉应吾指，巧在我心也。神定专注，心领神会，遇虚实真假变化之象，亦自然显于吾指之下，明我心中，透论审定生死。

李先生不仅医术精湛，学识渊博，而且医德高尚，他广交有志之士，慷慨好义，扶难济贫，对待病人，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医疗极为负责。特别是对疑难症状深入观察，仔细分析，熟虑精思，用药谨慎，使许多难治之病得到了挽救。对贫穷困难患者不仅免费还酌给药资。对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则锱铢必较。先生义举在封建社会来讲是难能可贵的。

之外，李先生培养学徒颇付心血，教学生知无不言，诲而不倦，循循善诱，究本溯源地开导学生，使学生顿开茅塞。师徒之间情深意笃，食同桌，坐同席。学生三年学业期满，李先生曾其资金叫开药店，各自营生。当时在沈村冷碛有范代禄、董药铺。磨西街上有山衡之、德妥有万红堂药铺。咱威有李顺伍、余炳芝药铺。这些都是李老先生培养的师徒开设的。其学徒，除泸定地区行医开药铺者外，还有远走他县各辟杏林，雄展济世之才。一时泸定县中医人才济济，春满人间。李氏医风及弟子医德闻于雅安、石棉、汉源、康定等地。至今李含章先生师徒后裔世代相传为医。

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废止全国中医”的反动论调，扼杀了祖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到祖国解放前夕，有名中医相继去世，所以泸定县境内就没有正统的中药店铺了（包括制药、炮制、加

工）。虽然长春堂存在时间不久，但它在治病救人，药理分科，培养学徒等方面对地方的贡献是较大的。

在建设四化的今天，为振兴中医事业，我们深深感到要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挖掘祖国医药遗产，整理中医学遗著，任重而道远，我们离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决心以老一辈医学家的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健康，为我州的中医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岳公爷打大岗”是讹传

阳 昌 伯

三百年来泸定民间流传着：“岳公爷打大岗”的故事，烹坝大渡河边有个“岳公营盘”在沙滩上用石砌成圆垒，大的一个，小的两个，另有较小方形垒一个，垒墙厚三、四尺，高六尺。民国二十年左右，还看得明瞭，以后垦成了农田。传说是：“岳公爷打大岗”时屯兵的营盘。旧列为泸定八景之一，称为“岳营背水”，任种德（旧中医）曾赋诗云：“背水声威夙有名，沉沙折戟献忠贞。筹边此日标青史，报国当年秉赤诚。戊卒远征关塞月，平蛮不亚岳家兵。江流滚滚成千古，想见古时大将营”。又说当时大岗打不下来，有个被俘去的号兵，在山顶上吹号，细审其音节是：“大岗难打，深沟难填，要得打贏，从湾东磨西面转（zhuan）——”，暗示了进兵路线，以后才平了西炉之乱。

在冷碛佛耳岩对门的营盘河坝，也有营垒，直径约三十余米，高约数尺，叫“瓦斯营盘”；在磨西从摩岗岭起，沿山脊到雅加埂大坪止，修有长一百华里，宽八尺至一丈二尺的行军道路，称为“营盘大道”，这两处都传说是“岳公爷打打箭炉驻人马和行军的地方。问哪个岳公爷？则有的说“岳升龙”，有的说“岳钟琪”，莫衷一是。这些传说，特别突出“岳公爷”是与史实不符的。

查《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川巡抚于养志和提督岳升龙因边事纠纷，贪赃枉法、互相攻击，双方控诉于朝廷。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解除了两人职务，并叫离任赴西安。是年三月经工部侍郎罗察等审察后，于养志被斩，岳升龙被革职从军。

所谓“西炉之役”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底的事。原来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在清初南下进入了康藏地区，打箭炉被其营官管理，在跑马山修建喇嘛寺，常以教权干涉明正土司政务，经常发生冲突。是年六月，明正土官蛇错噶巴被喇嘛营官噶吧昌侧集烈打死，霸占土官居住地方，进而侵略河东乌泥、若泥、九州等处，又在木雅抽兵。十一月侵占烹坝、擦道、进窥天全。这样川陕总督席尔达奏准把平西炉之役的任务交给了新任巡抚贝和诺和提督唐希顺。清廷还派侍郎满丕统领其事。唐希顺立即亲到化林营汛，抽调各镇、营官兵，固守要口。并采用化林营参将李麟的建议分三路进兵。“先命李麟率兵渡河占据咱威、奎武、咱里、烹坝等地，然后分三路阻击：第一路由参将马尔植自烹坝攻大岗，第二路由游击张自成自牛子攻哪咤顶，第三路由唐希顺率游击沙虎、魏国珍等自咱威攻磨西面”。（任乃强《泸定导游》）。“时昌侧集烈以五千人守大岗及哪咤顶，自率五千人据摩岗岭，唐希顺命李麟率兵绕攻摩岗岭，复于岭前仰攻克之，大军继进，连战五日克磨西，自雅家埂入打箭炉。张自成亦破哪咤顶来会。夺番营十四座，斩首千余级，惟大岗未克。番兵之守大岗，因山险固，垒石木其上，俯瞰竹关，见清军来攻，投以木石，人随石颠坠，且时出奇兵袭击烹坝。遂命泸定把总王元吉，潜率五百壮士，攀藤越壁，绕出岗后，排刃突出，纵火焚烧，群番大乱，斩首千余级，生擒数百人，会师打箭炉。斩昌侧集烈”。（档案县志卷·兵事）这场战役在十二月二十日告结束。唐希顺到达打箭炉后，又收复了木雅等地区，到康熙四十年（1701）春，西炉地区基本安定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是岳升龙被革职期间，《清史稿·列传八十三》虽有“……提督唐希顺讨之，上命升龙从军”等句，但据上面史料，岳升龙根本没有指挥具体战斗，打大岗哪里是岳公爷呢？烹坝营垒，是参将马尔植屯兵的地方；冷碛佛耳岩对岸的“瓦斯营盘”，定为李麟率先收复河西地面所筑；至于磨新营盘大道则为唐希顺所带部下所筑。

康熙四十一年(1702)唐希顺病卒后,又恢复了岳升龙提督的职务,巡抚换为能泰。吸取西炉之役行军困难的教训,准备在大渡河上架设铁桥。《御制泸定桥碑记》载:“泸河三渡口,高崖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设计建桥,升龙是参加了,但隔西炉之役,已是两年了。

岳钟琪是升龙的儿子,他到西康更要晚一些,自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侵占西藏后,清王朝分兵出征,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川滇兵西征,康熙五十八年(1719)命水宁协副将岳钟琪带领绿旗兵先行,进取巴塘理塘,以通藏路。岳钟琪进军时,泸定铁索桥已建成十三年,他过泸定桥还赋诗云:“泸水环迴城,天然界华羌。通津横铁锁,扼险壮金汤。影落鱼潜遁,虹蜺鸟避翔。丰碑留御笔,千古镇蛮荒”。康东地方都驻有官兵;交通畅行无阻,岳钟琪可顺利前进,用不着在泸定境内垒营驻扎,说他打大岗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为什么“岳公爷打大岗”之说讹传了三百年?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人们对历史真象不明白;二是封建统治阶级伪传历史,窃取别人的功劳为自己涂脂抹粉;三是由于岳升龙前后任提督多年,主管全川军事,西炉之役又得罪从军,其部下有意以大岗之役烘托其声望。总之,这个传说与史实是不符的。任乃强在《泸定导游》里说:“张增恕《泸定乡土志》知其谬传,而不敢易此岳字‘主张把’”“岳营背水”改为“古垒临江”或“平州古垒”方合。我认为把讹传改过来,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貌,作到存真求实,是史志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磨、新 瑣 談

王 福 安

一、龙的传说

磨、新地区在泸定县西面,是全县面积最大的两乡。它处在大雪山麓,原是断裂谷地,后因地质构造运动和冰川侵蚀作用,使东面雅加埂河和西面的燕子沟下切很深。两河之间形成一条长形的台地,北高南低,头大尾小。群众传说:“磨、新两地是一条上山龙,燕子沟是龙的上牙腔,堡子坝是龙的下牙巴,中间圆凸形的山脊是龙宝”。自远眺望,形极相似,十分壮观。这是群众对磨、新地形朴素形象的描绘。还说:“为了使上山龙稳在那里,上面有五棵大杉树把它钉住了,现在只剩一棵,如果砍了就要涨大水。”人们借迷信的说法,把那古老苍劲,年龄在千年以上的大杉树保留下来,成为磨、新地区一胜景。

台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东西山麓相距仅五至七里,峰峦起伏,白雪皑皑,驰名世界的贡嘎峰,就矗立在本区的西南面。

二、富饶的资源

磨、新人民,除利用台地傍山沿溪垦植农作物外,还入深山老林挖药打猎。那里出产大黄、贝母、虫草、独活、黄芩、党参等名贵药材,上山挖药是农闲主要产业;那里又有野牛、山羊、獐子、鹿子、老熊、野猪、豺狼、虎豹等出没,是天然的狩猎场;那里有广阔的原始森林,长着茂密的松杉树木,可供商品木

材几十万立方米，支援国家建设。民国时代，即有私人积股，开办木厂，把木材从雅加埂河送入大渡河，再漂向乐山重庆等地。解放后，林业更兴旺，是全县伐木的基地。另外境内溪沟纵横，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发展小型水电站条件最优越。区内伟晶岩石发达，蕴藏着优质的云母矿，可以为工业建设提供原料。解放后，海螺沟的秘密发现了，优美的风光不亚于“九寨沟”，为今后旅游事业开辟了新的基地。循海螺沟进去，可以直攀贡嘎山东坡，现在越来越为中外登山人士所注目。

三、古道和战场

在古代，兄弟民族和内地交易，都是翻雅加埂、沿磨、新河谷，越摩岗岭到咱威过渡，以沈村为最大市场。再翻飞越岭和大相岭到雅州。除岚安古道外，这是川藏交通的一条要道。其他的道路都开辟得晚些，如沈村通往冷碛的佛耳路是明代开凿的，岩州路是元代开的，由冷竹关经大咀通瓦斯沟的路是清末开的，所以翻雅加埂经磨、新到沈村是一条最古的道路。就到民国时代，宁属运销康定的油、米、糖、肉等都经过这条路，只是靠人力背运，跋涉艰苦。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平“西炉之乱”，清王朝分兵三路进攻打箭炉，第三路由四川提督唐希顺亲自率领，行军即沿磨新这条古道。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除以五千人阻大岗及哪咤顶外，自率五千人马据摩岗岭，唐希顺命参将李麟率兵进攻摩岗岭，并于岭前仰攻取胜，连战五日攻克磨西、斩昌侧集烈，经雅加埂入打箭炉，各军胜利会师。

古代战争留下的痕迹有“营盘大道”。从摩岗岭山顶起到雅加埂大坪合路止，长约一百华里，宽有八尺至一丈二尺，全部依山势蜿蜒修建。远处眺望，还可见其痕迹。在海传石壁上，用铁钩悬挂着大木棺一付，人在路上，伸手可以摸着棺底，五十年前有农

民邱海云、张玉林等眼见。距雅加埂三十华里的地方，名叫“**锅盔山**”，曾以乱石砌成垛子，作为战备攻势，建有滚木擂石，以阻**清军**前进，旧时称“蜜卡子”。在雅加埂山顶上，用乱石砌成一**碉堡**，高约一丈五尺，宽约一丈二尺，人们称为“台站房”。也是战争时修筑的。

四、强烈的地震

磨西位于**鲜水河**断裂带强震活动范围内，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六（1786年6月1日）发生七点五级大地震。山崩地裂，波及川西和川南地区，**连成都**均听到响声，**摩岗岭**崩塌，把大渡河堵塞了九天九夜，河水**暴涨**，坐在铁索桥上可以洗脚，冷碛、沈村平坝都淹没了。五月十六日，大水忽决，高数十丈，一涌而下，沿河居民悉被漂去，水到**嘉定**，又冲毁东城墙，冲走惊闻大水的群众不计其数。这次地震，从**摩岗岭**滚下一个大石头，水退后，它安详地屹立在大渡河东岸，人们取名“花石包”。据泸定地名办测量体积有7324立方米，它是磨西发生强烈地震的唯一历史见证，也是泸定风景之一。

五、多民族的地区

从磨西、新兴地名的演变，即可说明这一地区是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新兴原名“喇嘛寺”。因街头原有一个喇嘛庙而得名。一九三六年改名复兴场，一九三七年改为新兴场，一九四一年改为新兴乡。磨西原名磨西面。得名来历有三：一说是地处摩岗岭西面，因呼磨西面；二说古代这地方居住的是摩些人，没人叫它作磨西面，意指摩些人居住的那一面；三说磨西出产玉米，磨粉后运销打箭炉，康定人特称为磨西面，以粮食名称变成了地

名。总之，最早这里是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后来大部分藏族西迁，汉人进来开垦种植。到民国七年（1918）越西（今石棉）大发沟黑白彝内部发生纷争；部分白彝便迁来磨新一带落业，他们勤劳勇敢，居住高山坡地，开荒垦牧、放狗打猎；和老熊野猪作斗争，保护了庄稼生产，深受群众欢迎。以后又陆续迁来一些，到现在彝族已发展到一千七百五十五人，藏族六十九人，回族二人，土家族四人（1982年普查数包括得妥在内），加上汉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

六、旧社会的统治

旧社会，这个地区曾经受四种势力的统治，明清时代是余土司管辖的地方，土司有衙门，各地设头人和团首，是土司的下属干部。头人替土司管理民户催粮收租，团首替土司齐团调人，维持治安，齐团有牛角团、梆梆团、鼓鼓团，如果地方上发生了治安事情，立即吹角、打梆或敲鼓，集合人马，抵御外侮或平息内乱。那时土地全部为土司所有，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种地要给土司上官租，有时还要加租加押，勒索农民，封建王朝采取羁縻政策，只要土司和头人能“进贡”就是效忠；不造反就是服从，任其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第二种势力是袍哥组织，每个角落，都有其成员，民间细小事情的争执，都由袍哥大、二、五爷调解。

第三种势力是民国统治机构，改土归流后，全县设桥关委员一人。磨新两地各设保正一人，其下设乡约若干人，十家牌首若干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担任。这个组织维持到民国十八年（1929）。民国元年（1912）开始登记人口，征收田赋。由于地亩无法丈量，即按地租量的百分之五税率征收。除给土司的土地外，按耕种的人立户。磨西征了六十二石，新兴征了四十八石，秋收

后，送交泸定仓库。民国十三年（1924）川边镇守使陈温龄为了充实军饷，把磨新两地土司所管辖的土地，全部提归公卖。特派陈文奎、邵崇玉两员，临场估价，拍卖给农民，曾立官产执照，各人到县契税，这样农民才有了主管土地的权力。

由于磨新地带临近越西，易受黑白彝纷争威胁，遂于民国十八年（1929）设区团总一人，管理磨西、新兴、得妥、德威四地，改保正为团正、乡约、牌首原职不动。向人民派取“团学费”整训民团。民国二十四年（1935）红军长征经过泸定后，蒋介石的别动队到这里，进一步加强民团训练，抽调壮丁，培训保甲人员。改区团总为区长，改团正为联保主任，改乡约为保长，改牌首为甲长。又向老百姓征收保甲经费。民国二十八年（1939）改联保主任为乡长，下面保甲不动。乡设乡队副，专负训练壮丁的责任。民国三十年（1941）成立县议会，各乡成立乡民代表会，即是所谓的“民意机构”这个统治势力一直延续到解放。

第四种势力是帝国主义的教会。清末这片美丽富饶的地方，被法帝国主义分子所觊觎，他们凭借强加给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深入我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于清末派倪主教来康定传播天主教，倪派艾、明、傅、孙等神甫到磨西传教，趁改土归流之际，租用土司仓库为根据地，大肆非法掠夺土地，扩建教堂，以小恩小惠收拢教徒。最初磨新人民都不信奉天主教，那些外国人便习华语，穿华服，改华名，买贿华人，表面上办些学校，施舍些医药，收抚一些残废孤儿，于是信教的越来越多，部分人民的思想被天主教麻醉了。他们又趁陈温龄拍卖官产，农民缺钱买不起的时候，大量套购土地，几乎好的土地都被他们买去了。农民“反讨耕社”要给天主教交押交租。农民的汗血被外人残酷地剥削了。他们还支持教友担任行政要职，操纵地方政权，如1929年区团总刘品山，磨西团政郭相如，1940年新兴乡长喻俊良；县参议员穆仁杰都是天主堂支持出来的。教外的人和教友发生争端，天主堂要给教友撑腰，教外人交不起地租，要被扣押追缴。新兴

的王吉贵交租不清，竟被逐赶出境。在旧社会磨新人民就是在上述四种恶势力下挣扎活命的。

修堰和开田

从新兴到磨西落尾坝原来只有一条小水沟，供应农民饮水都不够，磨房修在台地两侧陡坎下的河边，推磨要爬坡下坎，背上背下，非常困难，台地上全是干地，没有水田，作物只有玉米、豆子、洋芋、荞子，缓处能产少量麦子、水稻全无，过年过节或生病时，想吃点大米，真是难上加难。1936年县长李林主张修堰开田，由山栋协助指挥，两乡人民共同努力，苦战两年，完成从新兴南门关起至落尾坝止，长约三十华里的大堰，随即发动群众开田，仅三、四年内，就把能开田的干地开成了水田，磨新台地上稻谷香了，粮食加工和照明利用水力发电也得到解决。1941年又从新兴的跃进坪起到落尾坝止，顺大堰修通一条长约四十华里的宽平马路，便利了交通，这堰、田、路都是磨新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八、欢庆解放

一九五〇年三月泸定解放，磨新人民翻了身，旧社会统治势力，一去不复返了。土地回到农民手里，生产蒸蒸日上，富饶的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兴建了公司、银行、粮站、中小学、医院和许多新式住宅，一条宽敞的公路由德威直通新兴，来往车辆，络绎不绝，促进了物资交流和市场繁荣，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美满的大家庭生活。“龙”的地方活跃了，雪山尽开颜，河水皆欢笑，它将以矫健的步伐踏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

古道·背子·口溜

倪德元 席珍 阳昌伯

古代由内地经过泸定境内到打箭炉的道路有三条：一是从全天翻山到岚安经烹坝、冷竹关、黄草坪、大岗、循金钗庙下，会头道水至康定，是元代全天人开的。清朝光绪年间，打通大嘴路，改由冷竹关经瓦斯沟至打箭炉。二是从全天翻马鞍山经五里沟、嘉靖河坝，过烹坝渡经冷竹关、合瓦斯沟的路，是明代开的。三是由荣经翻大相岭经清溪、泥头、化林、至沈村渡，过河经咱威越磨岗岭、唐西、雅家埂入炉城这是最古的道路。明朝以前都是走这条路。还有一条捷路是由子牛经杵坝沿山翻哪咤顶会合雅加埂路。明代永乐至嘉靖年间，打通佛耳岩后，才由沈村经冷碛、泸定桥、烹坝、瓦斯沟进炉城。一二两路称小路，原系古代全天“杨王”与泸定沈村“刘王”竞争茶叶贸易所开，骡马不能通行，全用人力背负。此路茶称为小路茶。民国时代以安一路已废，马鞍山一路尚通行。三路俗称大路，是川藏交通要冲，在川藏公路未修通前，为必经要道。民国时代还从化林经山王岗、夹厂到荣经开一新路，可以不翻大相岭直去雅安，行程可缩短一日。

这些古道都修建在峻岭深谷之间，有的傍山，有的靠河，有的凿岩，有的搭桥。但都迂回曲折，崎岖难行，特别是飞越岭、马鞍山、冷竹关大嘴，以及佛耳岩等处，陡窄艰险，跋涉其间，莫不胆颤心惊。但是千百年来，川康藏贸易，行军用兵，行人往来，都靠这些古道。运输方法半为骡马转运，半为肩挑背负，少数官宦富商，则以轿子滑杆代步。其中以肩挑背运者最为痛苦。

用体力背运的，称为“背子”或“背二哥”，凡在农闲时间，汉源、天全、荣经、泸定的贫苦农民都参与其事。运的东西以边茶为多，米、肉、油、糖、布匹次之。

边茶起运以汉源县泥头为起点，体强的背二十包左右，中等体力背十包上下，妇孺只背五六包，初习小孩背二三包，每包重十六斤左右，背前把茶包一层一层重叠，用竹签贯穿，用细篾编成背系，套在两肩上。手里握住一根丁字形拐子，拐尖镶着铁杵（叫着墩拐子），茶背上用竹片撇着一块玉米馍馍，小布袋里放着一块二三两重的块盐，是途中进餐拌豆花的佐料，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小篾圈，是专门括汗水用的。脚上穿着偏耳子草鞋，身披汗水浸透的衣裤，咬紧牙关，在崎岖艰险的道路上挣扎。为了互相照顾，往往成队背运，背子重了，挪分展寸地走几十步要歇一会儿，带头人在前用铁拐向地面石头上杵几下（称叫拐）暗示后者歇气，随后的依次杵拐休息，在路边排成一字形，用拐子支撑住茶背，两脚岔开直立，两肩仍套着背子，长长地松一口气，用竹圈括括汗水珠，片刻后，再继续前进。两肩和背心磨坏了，只有宿店后，喷喷盐水，解其痛苦。至今几条路上都留有杵拐子的痕迹。

从泥头运康定的茶包，按背负轻重，来回需十一天到十四天。每包茶运费只得得到一元左右，除去路上食宿费用，以背运十包计算，至多只能得到八元；加之起运处泥头的茶商不先付运价，要到打箭炉交茶后，才能领得运费，路上费用，靠高利借贷，每借一元要付一角利息，辛苦一场，落得几许？如果路上再遇风雨阻隔，或疾病缠绕，劳动人民的痛苦，更不堪设想了。

从泥头到康定背运茶包的有如下顺口溜：

一出泥头桅杆坝，老君关披坡是难爬。

三天三个坪，九天到炉城。

蓬巴堡去把酱油打，木瓜沟去拌豆花。

冷碛大桥头把工来耍，橙子坡坡实难爬。

碛碛房的花生抓几把，腰堂子的烧酒斟满花。
甘露寺和尚没答答，瓦脚十里到大坝，皂角顶过去金钗花。

磨子沟有个曾么大，大小两路都要去拜望他。

拢了皇桥杵一下，过桥就是几响刷。

打到大路人不谈话，打到小路人卷他妈。

过河就歇白日坝，去就碰到沙皮娃。

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吓，托得老子头眼花。

浑水沟的萝卜涨了价，弟兄们商量不吃它。

溜马槽的坡坡难得爬，咱里才去把工耍。

象鼻子岗岗风吹沙，伞岗坪的凉水涨了价，小烹坝的豆花炖空花。

水打沙湾是河坝，大烹坝的臭虫满街爬。

黄金坪的坡坡软塌塌，迴马坪的房子矮爬爬。

打儿窝的石头懒得耍，冷竹关尽歇女娃娃。

石门坎的梯梯实在多，大嘴上的凉水不好喝。

瓦斯沟去把青菜买几把，凉水井的水还吃得下。

……拢了大升航，算来银子统身上、拢了海盘石，算来将够吃、拢了椒子岗，算来要货帐。

一进东关口，大家邀约绑回手。

背大背，是勉强撑，对对罗罗吃一顿。

背子背上一百八，裤儿拉来挽疙瘩，背子背得杂，就怕三个砸。（顺口溜资料系已故区委书记高顺友提供）

这是一篇民间文艺，也是篇充满血泪的呼声。除了说明泥头到康定的歇宿地点和道路艰险，背运困难外，还揭露了阴暗的社会现实。磨子沟的曾么大，据了解是一位袍哥大爷，大小两路人都要拜望他，足见旧社会哥老势力之潜在力量。茶背过铁索桥，就要挨几响刷，响刷是泸定的土语，是吆鸡赶猪的竹制工具，这里指代桥关的苛捐杂税。劳动人民虽然没有文化？但以亲身感受借代修辞用得十分贴切，自从封建王朝把桥建好以后，即在桥东

设关卡，征收养桥税，除茶税由茶商付税外，每个茶背要缴四百铜元。连背柴火上市，每背要抽一根柴火过关。大路人（指荣经、汉源的背夫）可以勉强忍受，但是小路人（指天全）就会气得破口大骂。到了康定，认为银子可以统到身上，可是东算西算还要带帐，逼着找点回头生意（一般背羊毛）挣扎还乡，重重压力，何时才能解除呵！如果背的是日用杂货，更怕路上要遭三砸，意指兵痞勒索，土匪抢劫，和烟馆敲诈。这是旧社会见惯不惊的事情。背二哥们在路上劳动日久，衣裤破了，只好拴成疙瘩渡日，这忍受着何等的熬煎啊！所幸者沿途还可以吃点花生、烧酒、豆花、青菜和凉水，休息时候，摆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这些片刻的籍慰，又怎能补偿长期的苦难呢？

解放以后，川藏、泸石等路相继通车，一切物资均用车运，过去的“背子”才获得彻底解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新旧对比，真是两重天啊！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编 后 记

政协泸定县委员会贯彻省政协关于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意见的精神，于一九八四年三月成立文史组，开始征集、整理、编写本地区的历史资料。通过调查、访问、回忆、考证等多种渠道，到年底收到来稿三十多件，现将其中较有保存价值的选辑出版。

泸定县在古代长期受土司制度统治，大渡河东西两岸地域隶属关系不同，仅在民国二年（1913）才成立统一县治，故过去历史向无系统记载。民国九年（1920）张培超编辑《泸定县乡土志历史》民国二十八年（1939）任乃强写过《泸定导游》，民国十四年（1925）刘赞廷著《泸定县图志》，算是泸定唯一的珍贵记载，但都简略不详，西康建省后，有局部统计资料，皆散见于刊物杂志，零碎不全，失实处也不少。因此征集资料的时限，除戊戌运动起至文化大革命以前为主外，其他各个历史时期也在征集之列，并将征集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社会风习、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使泸定的文史资料全面系统的再现于史册。征稿原则，着重提供亲历、亲闻、亲见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据有大量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的论断。要求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存真求实，坚持真理，秉笔直书。

本辑资料蒙县党政领导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州政协的鼎力赞助，离退休老干部的详细审阅，在此深表谢忱。但是，由于资料不足，水平有限，经验缺乏，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尤其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史事不可能尽翔实，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敬请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意见。

马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第四辑
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康定县印刷厂 印刷

1985年3月第一版

印数：1—2500册

